

# 北外人 BFSU ALUMNI MAGAZINE

2016年9月刊 总第20期

缅怀先师  
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校友风采  
在炮火中高歌  
——访潘占林校友  
中国灵魂 世界胸怀  
——访万怡挺校友

彩笔挥翰  
从抗大俄文大队长到空军中将  
——将毕生献给祖国航空事业的常乾坤同志

September 2016



2016年9月刊 总第20期

主 管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 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友工作办公室  
承 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友交流中心  
《北外人》编辑部  
顾 问 韩 震 彭 龙

编审委员会

主 编 闫国华  
副主编 刘博然 蔡芝芳  
吴 浩  
编 审 周 静 郭 晓  
韩 雯 张珊珊  
文字编辑  
吕昕玥 董益君 孙洪淼  
王乃卉 刘惠中 黄颖芳  
荣筱萱 童 峻  
美术编辑  
姚盛科 肖 雨

## § 母校动态

## § 校友动向

## § 芳草青青

P18 毕业·起点——访毕业生孙越

P20 时光不虚度——访毕业生惠贞翔

P22 尝试中了解自我——访毕业生胡亚萍

## § 吾爱吾师

P24 文心 史情 言怀——访日语系邵建国教授

P27 不忘初心，方能始终——访法语系车琳教授

## § 缅怀先师

P30 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 § 校友风采

P38 在炮火中高歌——访潘占林校友

P46 奋斗与机遇——访张文梅校友

P48 中国灵魂 世界胸怀——访万怡挺校友

P51 专注俄语教研，开启人生格局——访李志强校友

## § 彩笺挥翰

P54 从抗大俄文大队长到空军中将——将毕生献给祖国航空事业的常乾坤同志

P62 一对外国夫妇 一个中国村庄

P65 我与美国海军大员打交道的故事

P68 欧元与我的欧元情结

P70 魂牵梦萦忆俄院

P72 盼望

P74 1966 届同学毕业 50 周年纪念

P75 行香子 毕业 50 周年纪念

## § 征稿启事

## § 回馈母校

# 我校召开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工作部署会



2016年2月25日，我校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工作部署会召开。

韩震结合学校实际，从三个方面对新学期学校的党委工作进行了部署。一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点，全面实施2016党建工作深化年的各项工作。二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和思政课建设工作。三要从严治党，讲纪律、讲规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

彭龙从七个方面对新学期学校行政工作进行了部署。一要推进“十三五”规划编制论证工作，全面实施综合改革方案。二要立足国家战略需要，优

化学学科建设布局。三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要创新教师管理机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五要搭建学术创新平台，提升学术核心竞争力。六要构建新型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机制，加强孔子学院建设。七要稳步提升学校办学条件，深入推进校园建设。

## 《人民日报》刊登张西平教授文章

201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登了我校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张西平教授的文章：《在平等交流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文章认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真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之为我所用；同时要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

北外将通过多种形式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并探索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话语体系，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 我校 8 个非通用语种专业获批成立

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及审批结果的通知》。我校 2015 年度向教育部申报增设的塔吉克语、阿非利卡语、阿塞拜疆语、格鲁吉亚语、马达加斯加语、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马其顿语等 8 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专业获批成立。

### 我校三学科入选 2016 年“QS 全球学 科排名榜”前 300 名

2016 年 3 月 22 日，总部设在伦敦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公布第六版《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我校三门学科进入全球前 300，语言学全球排名 51-100，现代语言学全球排名 51-100，英语语言文学全球排名 201-250。

作为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行榜之一，本次《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结果来自于过去 5 年全球最顶尖的 76798 名权威学术专家对学科的全面评估、44426 家雇主对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就业竞争力上的综合评价，以及对全球最大文摘数据库 Scopus 中 2850 万学术文献及 1 亿 1300 万引用数据的分析。

这与我校近年来发挥优势和特色，语言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度融合，形成特色鲜明的复合、复语型全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我校与多所国内外一流大学、智库、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培养人才及科研工作，探索我国专业特色型大学的学科建设、管理及人才培养模式，引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努力有密切关系。

### 我校 2016 年高招首 次启动综合评价招 生

2016 年 3 月 11 日，教育部批准我校今年实施综合评价招生。3 月 28 日我校综合评价招生报名已经开始，招生专业为俄语、阿拉伯语和各非通用语专业。综合评价招生是指考生按照我校招生简章的要求进行申请，通过初审的考生在高考后到我校参加外国语言文化能力测试（以下简称能力测试）。在录取阶段，我校将依据学生的高考、能力测试两个方面的成绩，以当地高考满分值按 7:3 的比例加总后形成综合评价成绩，从高到低录取考生。

我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在招生环节中进行能力测试，从而增加了评价因素，全面、综合和科学地选拔匹配的生源，为培养高端涉外人才，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家招生制度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是我校本科招生制度改革一大重要举措。

## 北京外国语大学庆中教育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2016年3月2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庆中教育基金捐赠仪式举行。江苏省如皋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晓东，市委常委胡拥军，副市长缪爱诚，如皋龙游湖外国语学校董事长郭庆，我校校长彭龙，副校长闫国华、贾德忠出席仪式。

如皋龙游湖外国语学校董事长郭庆向我校捐赠人民币2000万元，设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庆中教育基金，专项支持以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幼儿园建设为主的校园建设、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合作事宜。我校与如皋市政府、龙游湖外国语学校达成共建合作。

## 我校学生获第六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总决赛特等奖与一等奖



2016年4月2日，第六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总决赛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我校、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等20所名校的顶尖口译学子以及特邀的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选手同台竞技。我校英语学院的王越晨同学获特等奖，祁天同学获一等奖，这是我校学生首次在该项赛事中获得冠军。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于2009年创办，先后获得国台办和教育部的项目支持，是英汉口译界最具含金量的赛事之一。该项比赛也成为了深化两岸教育科研沟通、展现两岸学子风貌的主要平台。

### 公共外交“北京论坛”（2016）在我校举行



2016年4月10日，公共外交“北京论坛”（2016）在我校举行。本次论坛旨在加强交流、融通学术、服务社会，为逐步建立公共外交“中国学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我校校长彭龙，海南大学副校长、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刁晓平，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陆林祥，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艾平，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出席论坛并先后致辞，来自全国40余家高校、政府、智库和民间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受邀参会。会上，我校与中国人民大学、海南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建立公共外交学术共同体，以加强公共外交的全国学术联合，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 韩震书记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谈高校助力“一带一路”战略问题

我校党委书记韩震就高校如何助力“一带一路”战略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2016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17版发表了专访文章：《发挥高校优势，助力“一带一路”》。专访中，韩震书记就高校如何发挥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高校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新要求的发力点，如何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提供服务以及北外针对“一带一路”重大战略而制定的特殊人才培养计划等四个问题阐述了观点，并作了系统解答。

##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举行



2016年4月16日至17日，由我校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我校校长彭龙、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的1800名高校外语教学专家参加。彭龙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为外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高校外语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此次论坛的召开为推动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我校副校长孙有中，我校长江学者Alister Cumming分别围绕“指南”“标准”与“评价”三大主题词做主旨发言。专家们就高校外语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梅仁毅教授被授予美国研究终身成就奖



2016年4月29至30日，适逢美国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富布赖特项目”创立70周年，我校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与中美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梅仁毅教授美国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美国研究与中美人文交流”系列活动。

中美教育基金主席张之香向梅仁毅教授颁发“美国研究终身成就奖”，表彰梅仁毅教授在促进中国的美国研究学科发展以及增进中美人文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

### 第四届欧盟语言文化节开幕式举行



2016年5月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欧盟语言文化节开幕式暨“多样性中的统一：地区一体化视角下的欧盟与成员国”学术论坛举行。欧盟驻华大使史伟，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原驻英国大使马振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我校副校长闫国华出席开幕式。

闫国华回顾了过去一年中欧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表示，过去一年，中欧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北外在外语教学与国别研究方面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在欧盟成员国国别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举办的欧盟语言文化节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影响力。

### 校史馆推出常规开放日定时讲解服务

校史馆于2015年8月28日正式开馆。开馆初期，在讲解志愿者人员紧缺、课程紧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校史馆只能重点保障提前预约情况下的团体参观的讲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和测试，校史馆将于2016年5月11日开始，推出常规开放日定时讲解服务。此次常规开放日定时讲解服务的推出，将为周三到馆的个人参观者提供专业、细致和精彩的讲解服务。

校史馆讲解时间：

周三上午：9：00、10：30

周三下午：14：00、15：30

## 第三届北外“走近职场”就业力大赛举行



2016年5月1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三届学生就业力大赛决赛在阿语楼举行。

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赵雪宜获得“最具就业竞争力”奖，来自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曹丹丹和阿拉伯学院的姜迪分获亚军和季军。最具就业竞争力奖选手将获得 SPEED 海外游学机会全奖，亚军和季军将获得海外游学机会免学费奖。十六强选手将获聘北外就业创业 2017 届校园大使，同时获得学校提供的推荐信和就业助力大礼包。

## 第十九届“外研社杯”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总决赛在我校举行



2016年5月24日，第十九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总决赛在我校举行。

本届赛事从2015年11月开始校园选拔赛，经过2016年4-5月的地区决赛，共有122支学校队伍晋级5月18日开始的全国总决赛。八轮循环赛后脱颖而出的四支队伍，围绕辩题“THBT the state should establish awards to honor failures in business start-ups（国家应设立奖项以奖励创业失败）”展开终场对决。

外交学院蝉联冠军，杨清茹、李纪为摘取决赛桂冠；上海财经大学林启煜、郭辰获得亚军，我校陈咏嘉、梁潇，澳门大学黄嘉琪、梁嘉伟获得季军。

### 我校学生获第五届全国口译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2016年6月4日至5日,第五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交传决赛分为个人赛与团体赛两个部分。总决赛的个人赛共有24名来自全国八大赛区的前三名选手参与角逐,团体赛则是由各赛区派出三位代表组成大区代表队参赛。

我校英语学院翻译系大四学生祁天获交传个人赛冠军及最佳风采奖,英语系大四学生王越晨在团体赛中发挥出色,代表华北大区夺得团体赛季军,王颖冲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 彭龙校长在中波外交政策论坛发表演讲并接受新华社专访



2016年6月20日,在习近平主席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16+1”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波外交政策论坛:进展、潜力、前瞻”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我校校长彭龙参加论坛,发表题为“如何规划中波关系的未来:从人文和教育的视角”的演讲。

论坛期间,彭龙还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介绍了我校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在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彭龙表示,北外将在未来5年内开展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教学,为“一带一路”建设及“16+1合作”提供有力支持,将北外建设成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库型大学。

## 我校召开纪念周珺良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



2016 年是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我校教授周珺良先生百年诞辰。我校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下午，举行了“纪念周珺良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

周珺良先生珍惜人才、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周珺良先生潜心教研，躬身垂范，在我国英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英美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翻译和中国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在中西文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 中国 - 印尼高校智库联盟在我校成立



2016 年 6 月 25 日，中国 - 印尼高校智库联盟成立大会在我校举行。“中国 - 印尼高校智库联盟”吸引了双方重量级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加查玛达大学、日惹国立大学、北苏门答腊大学等 8 个成员。

“中国 - 印尼高校智库联盟”的建立，旨在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双方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议以及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联合公报精神，将进一步加强中印尼高校与智库交流合作，鼓励两国大学建立沟通平台，完善智库对话与合作机制。

# 我校举行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2016年是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作家王佐良先生诞辰100周年。7月16日，我校举行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杰出的教育家、翻译家、诗人和作家，他学贯中西，造诣深厚，是中国当代外语教育事业的重要先驱之一。1949年，王佐良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1950年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一直致力于外语教育与外国文学研究事业，为国家外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党委书记韩震表示，王佐良先生为我国外语教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饮水思源，可以说，没有王佐良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北外，也没有我国现在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局面。王佐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追求卓越，时刻心系国家，报效国家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与传承。在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成立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就是要继承先锋风范，激励后进继承老一辈教育家留下的光荣传统和宝贵财富，继续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校长彭龙表示，我们举办“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就是要纪念王佐良先生在外语教育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学习他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术境界，继承和发扬王佐良先生等老一辈教育家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高尚学术品格和精神境界，推动新时期北京外国语大学事业发展，推动国家外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外语教育事业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浪潮中主动作为，在承继传统，保持中国特



色的基础上，开阔视野，融会中西，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王佐良先生的学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作主旨发言。金立群深情回忆了在北外求学期间，王佐良先生在做人、治学等方面给予他的指导和影响。他表示，王佐良教授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师，他不仅仅是攀登学术高峰的人，他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奠定这个学科高度的大家。金立群介绍了工作之后，王佐良先生与他的交流往来与合作细节，尤其是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予他的指导以及《英国诗歌选集》的成书过程。王佐良先生在做人治学方面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于心，传承发扬。

纪念大会上，王佐良先生之子、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王立等，分别代表王先生亲属、学生、朋友以及外语文学界发言，深情回忆了王佐良先生的做人品格、治学风范，共同缅怀王佐良先生为国家外语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对王佐良先生的敬仰之情。

当天，学校还举行了《王佐良全集》发布仪式、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启动仪式、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仪式、“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等系列纪念活动。

### 马来语专业 05 届校友王晟向我校捐赠奖助学金

我校马来语专业 2005 届校友王晟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15 万元，设立“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晟马来语奖助学金”，专项用于支持马来语专业在校学生的奖助学金发放。

王晟与教育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教育基金会向王晟颁发了捐赠证书。

### 日语系 60 周年系庆活动暨 2016 校友讲坛第一讲举行



2016 年 4 月 26 日，日语系 60 周年系庆活动暨 2016 校友讲坛第一讲在逸夫楼三阶举行。日语系 75 级校友、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应邀为全校师生做“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的主题报告。讲座由校友办副主任蔡芝芳主持，日语系主任邵建国致开场辞。

讲座中，刘江永以中日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钓鱼岛问题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并通过展示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分享学术研究成果，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叙述。刘江永强调了日语学习在中日两国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向学生们传达了“学以致用，捍卫国家”的思想精神。

本次讲座学术性强，内容丰富。校友讲坛作为日语系 60 周年系庆活动之一，旨在发扬日语系“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它的成功举办为日语系系庆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 校友运动会第四季——定向越野举行



工作人员组织孩子们发挥想象力，作画表达“心目中的妈妈”，这是此次运动会特别设置的“献礼母亲”的温暖环节。之后的六个关卡分别位于荷花池、图书馆、英院、运动场、晨读园和丽泽亭，在通过颜色抢答、迅速配对、寻找锦囊、跳大绳、两人三足和绕口令接龙的考验之后，各队将会得到神秘联络人的信息。在找到神秘人对出暗号集齐拼图之后，按照指示到达最后一站——逸夫楼。在那里有孩子们充满爱的作品和最后的纪念印章等待着校友。最后，比赛队伍返回行政楼，根据比赛名次，领取校友会精心准备的纪念品。

活动中，校友和师生们不仅展现了竞技精神和合作精神，还呈现出默契十足，亲子和谐的美好画面。从刚开始校友们相遇的侃侃而谈到最后一刻的恋恋不舍，校友们手中拿着纪念品或孩子的画，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感受到了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还增加了家人、亲子间的互动，意义匪浅。

2016年5月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运动会第四季——定向越野赛在学校举行，该活动由校友创业的“拾果读写”独家赞助。此次校友运动会适逢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母亲节，27位校友带着孩子和其他亲属在这个日子重返校园，与教职工和在校生以运动和休闲的方式进行交流。

与之前几季校友运动会不同，坐在会议厅的有很多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为第一环节——自我介绍增添了不少天真有趣的色彩。为大家讲解完规则之后，校友和在校师生们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自愿组成五支队伍，每组都至少有两个孩子。五组队伍通过“你比划我来猜”游戏决定出场顺序，与此同时，



## 国际商学院举行“国商楼纪念砖”发布仪式



2016年5月14日，国际商学院与教育基金会共同举办“国商楼纪念砖”发布仪式，活动在西院综合楼一层报告厅举行。校长彭龙出席仪式并致辞，近80名国际商学院校友回校参加仪式。

国商楼纪念砖收藏活动是国际商学院联合教育基金会共同举行的公益性收藏捐助活动，筹集所得全部进入“筑梦国商”校友基金账户，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国际商学院的各项事业发展，激励品学兼优的经济困难学生，开展校友工作等，国际商学院校友会负责该基金的日常工作。此次活动不仅为校友回报母校提供了平台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校友情

谊，增强校友归属感，传承学院精神文化的重要方式。

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刘鹏，国际商学院校友会会长高翠兰，教务处副处长蔡连侨，校友办副主任蔡芝芳，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邵明星等参加仪式。

## 北外校友足球协会（筹）足球友谊赛举行



2016年6月18日，我校历届足球校队队员齐聚北外，与校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

校友足球队的校友来自外交部、国家汉办、江苏省政府、北京市团工委、中航国际、国际台、中国日报、道亨中国、惠普中国、中国信托、中技公司、中信、中国足协等单位。校友们重回母校，谈起学生时代的足球往事心情激动、感慨颇多。

比赛结束后，校友们与校友总会工作人员及在校生进行了交流，一致支持成立北外校友足球协会。

校友们感谢校友总会为热爱足球的校友搭建这一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校友们可以联络到多年的球友，切磋球技，加深友谊。

体育教研部霍伟明老师，校友总会刘博然、蔡芝芳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 北外 2016“语子偕老”高校校友联谊会成功举办



2016年6月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语子偕老”高校校友联谊会在阿语楼举行。联谊会由我校校友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七所高校校友会共同举办，76位来自各大高校的校友和高校校友会老师齐聚北外，开启了本次以爱情、家庭、婚姻为主题的校友联谊会。活动由校友办副主任蔡芝芳主持。

联谊会共分为自我介绍、三观大考验、你问我答、交换礼物四个环节。每位校友分别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毕业院校、毕业年份、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等。有的校友阅历丰富，对生活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的校友风趣幽默，爱好广泛。通过自我介绍，大家对彼此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接着进入了第二环节——三观大考验。校友们选择感兴趣的恋爱婚姻话题，组成六支队伍，经过三十分钟的讨论后选派代表上台做总结发言。其中，婚姻中是否应该留有各自空间、择偶中你最看重伴侣的什么品质、应该跟爱你的人结婚还是你爱的人、性格互补比较好还是性格相似比较好等话题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短短的三十分钟里，校友们积极讨论，畅言自己的观点，也结识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之后，进行了你问我答的游戏环节，此时校友们已

经从开始的拘谨到敞开心怀，与新认识的朋友们谈所欲言。活动最后校友们彼此交换事先为对方准备好的礼物，并相互留下联系方式，校友们均纷纷表示自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并衷心感谢主办方为校友们搭建的平台。

活动中，校友们展现出个人风采，结交到了新的朋友，气氛其乐融融。校友们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更认识了许多同龄的校友，收获颇多，受益匪浅，感谢校友会为大家提供这次难得的机会。

## 时延春大使参加位于开罗举办的中东和平论坛埃及启动仪式



2016年5月15日，北外校友时延春大使应邀出席在开罗举办的中东和平论坛埃及启动仪式。他在主旨讲话中说，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本着这一精神，中东和平论坛注重探索解决中东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新概念和新办法，为探讨解决当今中东地区所面临的各种和平与发展问题寻求方案，为中东的和平与繁荣、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出席启动仪式并发表埃方主旨讲话。与会者还就一带一路议题发表了看法。

时延春，我校1960级英语系校友，曾任我国驻也门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 我校2016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举行



2016年6月24日，我校2016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在行政楼507会议室举行。经过各院系、中心推荐，共有69位毕业生担任2016届的校友事务理事。

校友办副主任蔡芝芳向各位校友事务理事介绍了校友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校友事务理事的主要职责。英语学院彭玉芳、中文学院张素伟、国际商学院左安杰、亚非学院杨硕、欧语学院杨雨衡作为校友事务理事代表分别发言，他们表达了对学校的眷恋，也表示作为校友事务理事，今后将发挥好母校与校友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 毕业 · 起点

——访日语系 2009 级孙越



人物简介：

孙越，男，山东淄博人，2009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学习，2013年毕业后在日语系以教学助理的身份工作一年，2014年考入日语系就读翻译硕士。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翻译实践，完成译著若干，还参与了侵华日军史料纪录片的配音等工作。毕业后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日语编辑室工作。

第一次见孙越是在体育馆地下一层的当绿咖啡厅，孙越是个山东人，身材高大，笑容憨厚诚恳，即将告别这个生活了7年的地方，表情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感激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孙越是2009级的日语本科生，上学期间担任学生会主席，“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他对于学生工作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学生会工作并不仅仅是面向学生的，很多时候是面对团委，面对老师的，主席这个职务在更大程度上是沟通桥梁的角色。“虽然说学生是自我管理，但这种管理并不是说上下有别的管理，并不是主席一定要管部长，部长一定要管着副部长。做好了事情，肯定大家都有功劳，但是做不好事情，主席肯定是要担责任的。”孙越很谦虚，开玩笑说：“我担任了这么多职务其实类似于小时候，老师让纪律不好的同学担任纪律委员的。”据他说，他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推动自己，不让自己那么内向。

孙越总是在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学生会的这些工作让自己变得开朗起来，“不是自控，是他控。”他讲了自己在冬天做实习的例子，在室友还在睡觉的时候就自己出门去工作了，他说自己抗外压的能力比较强，如果任务在那里，就能做好，因为有这样一份责任在这里。“如果我觉得自己的能力是不胜任的。那我不会承担下这个任务的，接受一份工作的时候是要由很大压力的，就一定要坚持下来，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一旦开始做了，就算是跪着也要完成。”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举办过五四歌会、“三走活动”等，当被问到在这么多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他说，一定要多询问大家最近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心理，“你不是一个管理者，你是一个服务者，你需要大家由内而外的口碑。”

“北外对自己的性格影响还是很大的。”孙越说，作为一个性格相对

保守的山东人,之前接触天文地理,但没有真的接触到人文,接触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眼界大开,还有一个穆斯林室友,北外可能比不上北大清华的牌子,但北外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北外包容的不仅仅是全国各地的文化,它能包容全世界的文化。虽然自己可能不能变成那样的人,但是学会了尊重和接受不同的人。“我可能不认同你说的话,但是我会认真听,我会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认可别人的存在。”也许我们中一个人的想法今后会被否定,会消失,但是要认可和尊重别人的想法的存在。

孙越 2013 年日语系本科毕业后,当时系里正好缺少一个管理电力设备的老师,孙越就在系里担任教学助理,留在学校工作了一年,同时复习一年专心考日语研究生,之后成功考上日语系 MPI 研究生。当时不选择出国,是因为出国有工作和学习两个目的,个人并不是很想在日本工作,总归是要回国的,所以就不打算出国工作。后来在国内求职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有中日翻译的测试,孙越发现自己很适合也很喜欢这个方面的工作,研究生学习两年,觉得自己提升还是很多的,不只是学习知识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眼界开阔,是人生选择的更加清晰。这两年更像一个缓冲期,能够更清晰的认识这个社会和自己的现实生活。

孙越在上学期翻译了很多著作,大部分都是科普性读物,翻译的最多的是健康和人体方面的书。无论是人体、历史还是其他方面的翻译,都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全面提高了自己的日语水平。

谈到在北外印象最深的事情,孙越说是办完离校手续后,遇见了一个系里的老师给了自己这样的在学校工作机会,让自己在复习考试的这一年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这一年也更好的认识了身边的老师,看到了老师的学术活动,听到老师平常聊的话题,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老师编辑书本,面对这样的人群,感觉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自己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生在思考,让自己能够发散性思考,不只是在思考自己,这样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看老师编辑大学教材,自己也开始去思考怎么去传达信息,怎么去让别人更好的理解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这段经历对现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让自己在编译图书的过程中能够更多的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要因为到了大三课少了,就去实习,不要为了去实习而实习,你要去思考你去的这个环境能不能提供你想要的东西,不要单单为了那个零花钱而去实习。”他认为尤其是大二以前学习还是很重要的,实习工作一定要站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从学校毕业对孙越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期待他更好的明天。

(文 / 孙洪淼)

## 时光不虚度

### ——访法语系 2012 级惠贞翔



#### 人物简介：

惠贞翔，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2012 级本科优秀毕业生。成绩优异，多次参加系内举办的法语演讲比赛、法语电影配音大赛等。同时兼修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双学位，完成中法宪法教育法比较研究等论文。

采访惠贞翔是在他们拍摄完毕业照的下午，惠贞翔穿着法语系特有的毕业服，带着高高的毕业帽坐在笔者对面。采访地点是主楼教室，惠贞翔说：“这里曾是我大一上课的地方，一晃眼，今天就到了我的毕业日。”

笔者笑道：“这里是过去一年的教室，未来三年，我也不会再在这里上课了。时间过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你才大一，好好珍惜未来三年北外时光吧。”惠贞翔打趣道，他摘下高高的毕业帽，整整衣服，开始向笔者讲述这四年的大学生活。

## 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

惠贞翔说法语是他的第一志愿。法语和惠贞翔有着奇妙的缘分，在高一，当时他看到一篇文章里写中国用的单词是 Chine 而不是 China，他很好奇，于是专门去搜索了资料，才知道原来这是法语里面的中国，自此，他便开始接触法语，越接触越觉得法语比英语更为严谨，慢慢地他也爱上了法语特有的语音语调，在高考填写志愿时，他没有选择其他中国综合类 985 高校，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外，恰巧那一年法语系在陕西省招生，凭借优异的成绩，2012 年惠贞翔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一员。

大学四年，惠贞翔学习努力勤奋、成绩优异，多次参加系内举办的法语演讲比赛、法语电影配音大赛等，并取得可圈可点的业绩。他兴趣广泛，能力突出。学有余力，他在大二兼修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双学位，排名靠前，并完成中法宪法教育法比较研究等论文。法语专业四级 (TFS-4) 优秀，可作为工作语言；英语专业四级 (TEM-4) 合格，大学英语六级 (CET-6) 合格，可作为工作语言；能够熟练运用 office 等计算机软件，凭借这些优秀技能，惠贞翔在大四的实习

顺利结束，并得到了一份优秀的工作。

除了学业上用功努力，惠贞翔同样积极参加校园内外活动。他先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团讲演队综合事务部部长兼副队长职务、理事长职务，代表讲演队在校内参加朗诵比赛，多次获奖。统筹招新、排练、演出等，作为负责人与合唱团共同承办了“杨光讲唱会”的活动，并代表讲演队参加第四届北京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且荣获二等奖。

惠贞翔的社会实践经历也非常丰富，曾参加歆语工程活动并荣获多项荣誉；带领团队翻译法语著作《“中国人”弗朗索瓦·杜赫提尼与“日内瓦人”秦大尼——汉学家与他的合伙人》；并在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实习。这四年惠贞翔在兼顾学习的同时，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他说这是为了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

勤奋、努力、细致，是优秀的品质，无论在何地何时都是被世界所认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凭着一股毅力，惠贞翔成功地打造出他独具特色的面孔。

## 少做点无用的事

“少刷微博多读书，少看票圈多运动”这是惠贞翔对自己的勉励，他每月都会给自己出一份书单，然后利用碎片时间，在 kindle 上读完这些书目，遇到喜欢的地方也会做点批注写写感想。此外，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去学校操场跑上三公里。

惠贞翔说，在体测前，每天去跑步的同学很多，但考试一结束，能坚持下来的人少之又少。当目标分散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变成日日的枯燥重复，日日坚持，也随之变得可笑。但惠贞翔还是继续在运动，他说这不是为了体育成绩，也不是健身减肥，只是享受一个人跑步独处的时光。

惠贞翔是枚不折不扣的科技产品狂热者。他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跑遍大大小小的体验店去看新出的手机，再用一整个下午给每个上市的手机写感想，洋洋洒洒，一挥而就。

就像白岩松所说，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大多数人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通常响亮的口号是“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我们要经常停下来，面对自己，和自己对话，成为自己的朋友。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或许结局都会令我们的生活

更加靓丽。

## 我们的黄金时代

惠贞翔在 2014 年七月至八月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歆语工程”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赴甘肃通渭马营初级中学进行英语支教活动，主要负责讲授英语语法、实用法语等课程；并和团队采访当地英语教学情况，撰写《“以甘肃某村为例探究农村英语教学现状、误区及改进方法”调研报告》。

2014 年惠贞翔荣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团员称号，此外获得 2014 年度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和 2014 年度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奖。2015 年一月至二月惠贞翔在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实习，主要从事阿尔及利亚住房项目资料的法语翻译和项目部出国人员的法语培训工作。2015 年 5 月至 7 月惠贞翔带领一个小团队翻译一本法语书籍（法译汉）《“中国人”弗朗索瓦·杜赫提尼 (Francois Turrettini) 与“日内瓦人”秦大尼 (Tschin-Ta-Ni)——汉学家与他的合伙人》。今年三月惠贞翔最终被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录用。

惠贞翔谈起这四年的生活，他说大二上学期是最迷茫的时期，当时面临大三出国交流和留在学校修双学位的选择，是背井离乡还是继续在国内打基础，这两个选择令他纠结，那段日子，幸好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让惠贞翔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但惠贞翔也说，大二或许是这四年最美好的日子，没有大一的无所适从，没有大三的忙碌，没有大四的混乱。

是的，青春是一生中最迷茫、最焦虑、交织着绝望、希望和挑战的时期。但所有人都说青春是美好的。悲伤的时候，即使有太阳也觉得天昏地暗；开心的时候，即使下着大雨也恨不得出去奔跑。这种自由随意，到了中年就不可以了。

“每当我遇到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总会很好奇地想：老天爷又打算给我什么新的机会呢？”这是惠贞翔作为青春回忆最终的结语。

最后，祝愿惠贞翔前程似锦！

（文 / 荣筱莹）

## 尝试中了解自我

——访国商 2016 届学生胡亚萍



人物简介：

胡亚萍，国商 2016 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前国商团学联主席，目前在腾讯工作。

当绿的午后时光故意放慢了一个步调，过滤掉来人的匆匆脚步。“你好！”胡亚萍穿着一身连衣裙，笑盈盈地过来了。

### 活动积极，发现兴趣

“我平时不爱闲着，大一一开始就积极参加各种社团和社会活动。”胡亚萍开门见山说道。

大一上学期，胡亚萍参加了汉语桥助教的选拔，并且成功入选，在暑假时协助汉语桥课程的进行。在大二那年，机会再次来临。当时新东方招募假期海外游学领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去了。记得当时我还挺叛逆的，逃掉了课去听宣讲，认为自己感兴趣的事就一定要去做。”

“这个选拔持续了一年，经过培训和多轮考核，胡亚萍最终入选，在大二那年的暑假，带领几十号初中生到美国游学。“其中的培训和考核过程非常耗时间，通常考核是以举办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被考核者负责带领初高中生开展小组活动，考核者会在一旁对我们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合作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进行评定。其中还有一场考核是自己举办一场班级活动，于是我就向高中班主任借了她的班级来进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核，终于，与其它几位入选者一起，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这些培训和考核都是胡亚萍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的，“走好其中的每一小步，就是一次成长。而乐趣就存在于这些成长里面，你会突破自己的壁垒，尝试新鲜事物，然后突然惊叹，‘哇，原来我也可以！’对我而言，这就是玩和学的结合。”

大一时，胡亚萍进入国商团学联外联部，“这个部门需要和人打

交道，正是我喜欢的！”在大二时，胡亚萍被推选为外联部部长，大三时，成为团学联主席。“在担任团学联主席的这一年，我学到了合作。我和当时的副主席做事风格互补，我注重大局的把握，他很关注细节，比如在筹办迎新晚会时，我主要负责整体流程的规划，他会叮嘱部员们发通知短信时统一格式，节目单的摆放要和水对齐，在这样的合作中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彼此相互依靠。”

此外，胡亚萍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她在国商男篮担任经理，负责支持队员们的训练和比赛。“每次为队员们准备水，组织大家为他们鼓劲加油，都在无形中让我更加有耐心，学会如何与人良性沟通。队员们开心训练，积极比赛的场景，就是我幸福感与成就感的来源。”

## 多元实习，职业定向

大二的时候，胡亚萍还参与了普华永道 Leap 俱乐部，并进入普华永道实习，做审计工作。繁重的活动、实习和学习都被胡亚萍安排得井井有条。

大三寒假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胡亚萍在普华永道的媒体审计组实习，“为了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让未来职业生涯有个好的起步，我选择了审计作为第一份正式实习。试试不同行业，亲手做了，才知道自己喜欢哪一行。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一行都要试试，我建议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此外，她还拿到了阿里运营和腾讯市场的暑期实习生 offer 等。

大三寒假，胡亚萍进入咨询公司实习，主要负责品牌咨询这一块。

大三暑假，胡亚萍收到了欧莱雅的实习 offer，“外企比较能激励人成长，我想在快消紧张激烈的环境中锻炼一段时间，看自己是否能跟上这个节奏。外企中人会感到无形的压力，没有硬性的指标线，但是对细节的要求却不低。外企大家的表达都比较直接，会径直传达自己的想法，有要求也会直接提出来，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大三整个暑假在欧莱雅实习完之后，我感到自己还是不喜欢长期高压的环境，于是在大四投递简历时选择了腾讯。外企对我而言，作为实习很快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作为正式工作的话，可能没有好的生活节奏。相比较后，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外企，这也是修正了我大四找工作的方向。这些尝试，对我来说也是发现、了解自我的过程。”

大四上学期，胡亚萍收到了腾讯的 offer，并在 10 月到 12 月在腾讯实习。”

目前，胡亚萍已经正式入职腾讯，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成长着。

## 学习勤恳，不留遗憾

除了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实习，胡亚萍在学习方面也没有落下，“大三那年，我告诉自己，最好能拿到一次奖学金，这样就圆满啦。”在竞争激烈的国商，拿到奖学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亚萍说到做到，兼顾实习和学习，最终拿下了一等奖学金，得知自己拿到奖学金那一秒我告诉自己，大学生涯圆满了，没有遗憾，哈哈！”

“祝愿学弟学妹们能做个不倒翁，别被自己打倒！勇敢去尝试，了解你自己！做人嘛，就是要开心！”

胡亚萍的一席话，仿佛让咖啡里也氤氲着喜悦的气息。

无论学习、活动、工作，都是了解自身的过程，祝愿我们能一直不竭成长，收获丰实。

(文 / 董益君)

## 文心 史情 言怀

###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邵建国教授



#### 人物简介：

邵建国，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教授。海淀区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获九州大学博士（文学）学位。目前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史、中日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日语系 1956 年诞生于外交学院，经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1981 年独立为日语系。今年正好是日语系创立六十周年。为了解邵建国主任的学术生涯以及我校日语系的建设和发展，笔者采访了日语系主任——邵建国教授。

### 一种缘分 初识日语

邵建国 1957 年出生于河北省。1977 年，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邵建国是文革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学生，他有幸考取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专业。

邵建国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前两年的基础课阶段，他同时学习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而到了大三、大四，每个人需要选择国别史学习。由于受文革的影响，邵建国自身英语基础薄弱，便放弃英美等国家历史的研究，而选择研究日本史。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学日本、学西方成为当时的潮流。最令邵建国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而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却那么曲折。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里有一位知名教授吴庭璆先生。老先生是战前日本京都大学的毕业生，邵建国十分崇拜老先生的学问和为人，

便决定跟随老先生学习日本历史。在恩师的教导下，他对日本的了解越来越多，兴趣也就越来越浓。

邵建国深知学习外国史必须首先学好语言，这样才能够通过原始资料来研究其国家历史。于是自一开始邵建国便选修日语课程，虽说一周仅有四节日语课，但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练习日语，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仅用一周时间便将五十音图全记住了。

他的日语启蒙老师是李约瑟先生。据说李先生在东京呆了十八年，有着非常地道的东京音，这位日语启蒙老师认真细心，帮着班里的学生纠正发音，邵建国获益匪浅。

邵建国说自己学日语是从阅读开始的，毕竟自己不是日语专业的学生，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他笑着说当时自己对日语只会看不会说。他回忆大四那年，有位从日本来的学者访问南开大学，客人问：“厕所在哪里？邵建国却听成了“这里能不能通过去”，还一脸正经地说：“过不去。”因此闹了个小笑话，至今提起仍觉得脸红。

### 游学十年 百味陈杂

1982 年邵建国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因为是

河北的生源，他被分配到河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在河北大学的八九个月中，学校还没有给他安排讲课，所做的大多是监考等辅助工作。

“书到用时方恨少”。邵建国还是感到作为一名本科毕业生，要去教本科生，实在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于是邵建国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进一步钻研学业。

然而在当时，作为刚刚分配来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仍被看做是稀缺人才。因此河北大学刚开始并不同意放邵建国离开河北大学。

当年的考研，有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可以出国攻读硕士、博士。因为名额有限，邵建国就向院系打报告说，如果能考上出国名额，就离开河北大学去国外读书，如果没考上出国名额就继续留校任职。

于是邵建国开始了紧张的备考，努力的成果也没有让他失望，当年成功考研成为了吴庭璆先生的出国研究生。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邵建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语言培训，一年后邵建国离开中国，踏上了去日本九州大学的求学之路。

然而到了日本，求学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九州大学要求留学生们要通过他们的考试，方可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于是邵建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将自己的本科论文翻译成日语，成功通过了九州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开始了硕博连读的留学历程。

这期间，邵建国参加了当时九州大学专门针对留学生开设的高级日语学习班，在日语老师的指导下苦练日语。自此邵建国的日语才真正开始走向正轨。

邵建国回忆说，当时九州大学文学部里留学生很少，所以他几乎每天都是和日本学生混在一起。每天的午餐晚餐也都是和日本学生相约一起去吃。每周参加一次研究生的学习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喝酒。一次会二次会三次会，有时能到晚上两三点。这样的氛围熏陶下，邵建国的听力、口语、会话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他的日语不再是浮于表面，而是真正深入其中。

1986年邵建国硕士研究生毕业，1986年至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里，要拿到日本的文学博士是极其困难的。邵建国用了近八年的时间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日本做历史研究，导师要求一定要有新观点，

新发现。博士论文需要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史料，提出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观点，这是极为艰难的。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邵建国也曾面临重重困难，一度想过放弃。期间曾有一家日本做会展的企业问他愿不愿意去他们公司就职，邵建国考虑了一夜便回话说自己还是选择完成学业，他认为取得博士学位更重要。

1995年3月，邵建国终于获得了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 机缘巧合 教书北外

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邵建国决定回国。1995年的夏天，邵建国回国求职。他先后去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面试，最后基于地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考虑选择了北外。

邵建国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教授日语的老师，来北外日语系求职也是偶然。由于邵建国不是外语系本科毕业，怕一开始教不好日语基础课，曾向当时的系主任提出先不给他安排外语基础课，只安排高年级的会话及中日关系史等课程的要求。

来到北外任教已经二十多年了，从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邵建国觉得我们的学生不能光学习外语，而不学习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在日语系开设的很多选修课中，邵建国特别重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比如他开设的《战后日本政治和外交》这门课，不仅讲授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讲授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关系。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近代日本思想史》这门课，立足于比较文明的视角，讲授明治维新后日本与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课堂上，他坚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努力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自在的交流氛围。除了个性化的教学风格，邵建国对日语本科人才的培养也有一套独到的理念。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虽然学习日语的同学大都是零基础，但大多数学生都有到对象国进修学习半年或一年的机会。他鼓励学生们抓住这些机会，多多参与驻外使馆等机构组织的各种活动，使学生能在更深的层次上了解对象国的国情和民情。他希望学生不仅要掌握语言技能，也要了解对象国的国情和文化。

谈到学术研究，这些年邵建国著书和论文颇多，

## 吾爱吾师 TEACHER STORIES

例如《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日本政治中中间派政党的政治主张和作用》、《小泉的政治手法与小泉内阁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永井柳太郎的对外政策论》、《战前日本的“东亚协同体论”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与中日经济互利》、《美国 TPP 经贸战略中的日本要素》、《从沈阳领事馆事件看日本政治》、《日俄战争前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开战策动》等等。

这些科研成就对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中日公共外交等方面贡献颇多。

### 结语

---

今年是北外日语系创建 60 周年。一直以来，日语系在我国外交人才、日语教育人才的培养方面，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展望未来，日语系仍将保持它的学科优势和优良传统，继续为我国的外交事业、日语教育事业、对日研究贡献力量。我们也相信随着北外多语种、多学科建设的飞速发展，日语系也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文 / 荣筱萱)

# 不忘初心，方能始终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车琳教授



人物简介：

车琳，教授、博士生导师、法语系主任。1993年开始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过的课程有法语精读、汉译法、法国古典文学、法国现代文学和法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5次获得北外“陈梅洁基础阶段教学奖”以及北外优秀博士论文奖、卡西欧教学奖、师德先进个人等奖项，2015年被评为北外卓越青年教师。主要译著有《说服——关于雄辩的对话》、《瞥见幸福的颜色》、《电影导演论电影》等，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中、法文论文30余篇，并在法国出版法文撰写的比较诗学专著《中国诗歌传统及其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会通》(Entre la tradition poétique chinoise et la poésie symboliste française, L' Harmattan, 2011)，该著作于2015年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近年来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当代外国纪事1980-2000》法国卷子项目。

车琳是法语系温婉清新的女神，同时也是育人为本、不忘初心的法语系名师。怀着激动的心情，笔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车琳，下面是这位女神教授的个人经历和治学育人的心得。

## 一个错误，是一切美丽的开始

“当时我进北外，其实都是美丽的误会”，作为当年全国高考英语单科状元的车琳，在填报志愿时并没有报北外。说起当年“误打误撞”进入北外的经历，车琳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当年北外第一次在安徽省招生，省招办发布的《高考志愿指南》中遗漏了北外的名字。由于车琳决定学习一门既“小众”但是又用途广泛的语言，因而在填报其他外国语学院时第一志愿都选择了法语专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因英语成绩优异和浓厚的法语情结，被北外法语系选中。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虽然有点意外，但生性恬淡、随遇而安的车琳坦然接受了这份来自这所在当年的安徽并“不知名”的大学的邀请。

在北外本科的四年学习中，车琳认真学习法语，

专心投入，毕业时因为专业成绩优秀而被法语系老师们一致推荐破格留校任教（因为当时法语系师资已经需要硕士研究生了）。谈及当时与现在的学习氛围的差异，车琳认为现在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通讯网络更加发达，同学们的视野更加宽阔，但是精力更容易分散，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校园物质条件有限，社团活动不多，同学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地投入在专业学习、课外阅读和学科活动上。那时候没有手机和网络，每天傍晚，在操场上，同学们人手一个收音机收听法语广播，或是自发组成法语角练习口语，对专业学习帮助很大。每周一晚上系里安排放映一场法语电影，全系同学就像参加盛会一样兴高采烈，非常珍惜接触原汁原味法语的机会。

四年毕业后，车琳以进修老师的身份去法国留学一年。在法国的留学，也让她感受到了中法之间很大的差异。法国公立大学不需要入学考试，只需毕业会考成绩就能注册专业的录取方式，因此本科生的淘汰率能够达到20%~30%。但这样宽松的学制无疑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给了学生更大的自

## 吾爱吾师 TEACHER STORIES

由。而且，法国大学校园内并不提供学生宿舍，大学生也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中国的大学通过高考来选拔优秀学生，校园里的学习、生活、住宿等各项条件便利，得到的保护也更多一些。

法语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车琳就曾经被借调到中国驻加蓬使馆工作过。谈及这段工作经历，车琳表现出了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喜爱。热带花草树木鲜艳的色彩，热情明媚的阳光，都是这个地方留给她的美好回忆。中国在加蓬工作的援外工作者大都不懂法语和当地语言，车琳自称“好为人师”，每周会利用休息时间重操旧业，义务为大家教授法语。她在使馆商务处一直从事调研工作，同时还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任务，就是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为大家做点实事，定期出一份小小的报纸，向当地华人介绍加蓬国情，翻译一些时事新闻，帮助大家适应驻外的生活。这份小报纸还在1995年加蓬爆发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车琳在报纸上介绍当地疫情的防治情况，宣传预防埃博拉病毒传染的途径，减少中国通报的恐慌感。这份报纸一直持续到车琳结束驻外工作离开加蓬回国，后来也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在加蓬工作的中国援外人员真有些小失落呢。

### 相信命运是最好的安排

之所以会选择法国文学作为专业的方向，车琳说那也是因为系里有需要。虽然当时对文学的选择有被安排的原因，但与文学相遇后发生的一切美好都是自己内心对文学的热爱。

在车琳看来，中国文学起源早，是东方文学的典型代表，而且数千年来自成体系，直到近代以后才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而法国文学发源晚，直到九、十世纪之交才形成自己的国别文学，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开始和欧洲其他文学的相互参照和影响，既有自己的传统也更加具有开放性。这两种文学传统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作家和文学经典。

现在很多学生认为文学没有很大的实用性，车琳认为在这个非文学时代依然要在外语教学中坚持文学教学，因为首先文学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一个人的素养，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可以做到言行得体，处事观物具有洞察力，为人处世比较豁达。文学作品也是学习语言的重要素材，文学教学是一种融合

语言技能和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车琳还举了最近的一个例子：几年前毕业的一个学生，今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他决定在新员工的联谊会上朗诵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片段。他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当年车琳的法国文学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在课上曾经得到朗读这一片段的机会，声情并茂的朗读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出色的朗诵才华也被老师发现，这成为他大学时一个美好的回忆。车琳一直认为，文学课堂应该成为教师、学生和不在场的作家围绕一篇文学作品进行人生经历分享和精神交流的场所，文学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一个高雅却封闭的系统，而是紧密联系人生经验和社会生活的。车琳还给出了一个精妙的譬喻：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名词”，那么文学就是“形容词”，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在车琳看来，北外的杰出校友、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先生就是一个优秀的榜样，他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金融外交家，而且精通英法双语，令人敬佩。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大家都知道目前高校教师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车琳老师选择了教学为先，同时也没有放弃在科研上的钻研，仍会从事翻译和著述，发表科研论文，在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领域坚持自己的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她被评为首届北外卓越青年教师，且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这些都是对她辛勤耕耘的最好嘉奖。

在法语教学中，车琳可以说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在如何让学生们感受到法国文学魅力这个问题上，车琳举了一个例子。在本科三年级第一堂法国文学课上，她都会给出两篇有关港口的文章，一篇是介绍法国敦刻尔克港的说明文，另一篇是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港口》，从对比中教会学生说明文给我们带来实用的信息，但是要找到美的感受和心灵的共鸣，还是要从文学作品中寻找。

对于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车琳更是有自己的办法。在对一个作品进行赏析时，她能通过互动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走入故事中：如果你是17世纪剧作家高乃依名著《熙德》的男（女）主人公，在面临爱情与家族荣誉的双重考验难题时，你会怎

## 守望

样选择? 这样的方法不仅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作品, 还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心。

车琳认为, 老师应该要做到对学生“严格而不严厉”。她坦言, 这样对老师来说, 确实有难度, 但如何寻找到严格与严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则是老师需要探索的。既要做到对学生高水平要求, 又要做到让学生接受这样的方式, 不反感, 不排斥, 这是为人师的艺术。

说到对未来法语系毕业生的期待, 车琳表示最重要的一定是过硬的语言专业素质: 具有专业意识和态度, 通过专业训练, 才能达到专业水平。一个认真努力的语言专业学生, 他学习的不仅是语言, 而且得到了一种人文教育, 在日日更新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培养了自己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 这些都有助于将来适应新工作、新环境, 无论进入什么领域都可以很快上手。既有语言素养, 又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 要做全国法语教学研究的标杆

作为法语系的系主任, 车琳和同事们共同完成了很多工作。车琳表示, 尽管科研很重要, 但是学生在四年内学到的知识和培养的能力对他们未来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北外毕业生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所以, 目前系里还是坚持把教学和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 而且一定要做与我们的品牌相匹配的教学。

其次是学科建设。相对很多法语专业相对单一的学科设置, 六十六年来, 北外法语系针对较多的学生人数和多元化的需求, 相继建立了语言学、文学、翻译和区域国别研究四大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梯队。目前, 我校法语系师资缺编, 仍需不断推进师资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 同时还需要加强科研和学科建设, 努力把法语系建设成一流专业。

去年, 法语系还成立了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 开设了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高端论坛, 定期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讲座, 这也是国内唯一以法语为工作语言、以法语国家与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坛, 吸引了很多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来参加, 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品牌, 提升了北外法语系的学术声誉。

关于校友工作, 车琳表示法语系校友对系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让她很惊喜, 也很感动。法语系从1950年建立至今, 共培养了4000多名毕业生, 他们工作在外交、经贸、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 遍布数十个法语国家与地区。北外有“外交官的摇篮”之美誉, 共培养了400多名驻外大使, 从法语系就一共走出了50多位大使。去年65周年法语系系庆时, 400多名法语系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系友纷纷赶回母校来参加系庆, 他们当中有退休的老领导, 也有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 在这次盛大的聚会上, 大家序长不序爵, 亲切温馨得像一个大家庭, 感人的时刻令大家的情绪几度失控。

法语系还不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校友回系里进行主题讲座, 与在校学生或进行学术交流或进行职业生涯指导, 车琳非常感谢各届校友对系里的支持。如果有校友愿意回母校访问, 法语系也给予热情接待, 就在今年上半年, 系里很高兴接待了阔别母校、侨居法国数十年的系友陈林洪先生。法语系在系庆之际还通过各个年级的联系人, 建立了庞大的系友微信联络群。此外, 北外在海外的第一个校友会就是法国校友会, 由法语系系友集体创办, 现任会长是刘亚中先生, 为在法国的北外校友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助的平台, 也为法国校友会与北外母校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车琳说, 母校就是一棵大树, 守望着从枝头远飞的鸟儿, 欢迎法语系的毕业生常回来看看……

最后附上车琳对法语系学生的亲切寄语——“玉不琢, 不成器”: 一定要学好专业, 同时拓宽视野, 希望毕业以后依然保持对法语的温度和学术好奇心!

(文/黄颖芳)

## 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王意 苏怡之 王星



浙江省人杰地灵，历来是中国人才辈出的地方，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的王佐良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从上中学时起，他对英语教学和英国文学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和翻译家，跻身于国际上最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之列。王佐良这一名字已经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高峰联系在一起了。

童年时的王佐良跟随在一家小公司任职的父亲住在今天的武汉市，小学和中学分别就读于汉口的宁波小学和武昌的文华中学，后者是一所由英美圣公会等基督教派开办的教会学校，除了国文（汉语）之外，该校包括体育在内的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这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从中对外籍教员的教学方法也有了亲身的体会。中学毕业时，他原本准备投考大学，不料父亲所在的公司破产，家里无法支持他继续上学，他不得不求职自谋生路。经过努力他考入湖北汉口盐务稽核处当了一名三等课员（会计）。一年来他省吃俭用，凭借微薄的薪金攒下了300元钱，终于得以继续求学。1935年，王佐良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辗转迁往湖南（长沙、南岳）和云南（蒙自、昆明），后在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

学生时代的王佐良已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读中学时即已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先是以“庭晟”、“竹衍”、“行朗”等笔名在武汉一些报纸和《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上大学后继续发表了《武汉》、《北平散记》等纪实文字，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记》等政论报道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进步思想；其间还在昆明《文聚》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但他更多的是写诗。可能是因为主修外国文学的缘故，他的诗风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大。早期的诗作除在《清华周刊》、《时与潮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之外，闻一多所编的《现代诗钞》中亦有收录。后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24—）也曾翻译过王佐良在昆明时写的两首诗，收入其所编的瑞典文版《中国诗选》中。

在大学一年级时，王佐良的英语写作也初露头角，二年级时的英语作文成绩常常名列全班之冠，并曾获得全校英语演说比赛的第一名，为此经常受到贺麟、吴宓、王文显、陈福田、叶公超和钱锺书等名师们的赞许。在当时任教于清华、后成为著名诗人的英籍教师燕卜苏（William Empson, 1906—1984）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英语版原著，尤其对英国诗歌和诗剧感兴趣，自己也写了一些英

语诗，其中的几首曾刊登在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生活与文艺》（Life and Letters）上。

1939年，王佐良毕业于融汇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学风的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以外，还与当时中国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曾于1943年3月至8月兼任昆明干海子美军炮兵训练大队首席教官的秘书和高级译员，以其渊博的英语专业知识的特长，协助盟国在中国的军援工作。1944年5月至1945年9月，他兼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一段时间内每周都用英语撰写一篇时评并亲自在昆明广播电台播出；还在《天文台》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分析战局和介绍中国抗战形势的文章，并对中国文坛的动向多有评介，俨如一位多产的新闻记者。这些工作都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文化特色、提高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声望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使他的分析观察能力和中英文写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文字材料与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多位著名学者创作的对外宣传作品一起被结集出版。其中一本是由他独立用英语撰写的《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其内容涵盖了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约1943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简要叙述了新文学的发端时期各种流派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包括鲁迅和在延安的艾青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化人及其代表作品，也概述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内容、特点和风格。该书总结分析了中国新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和历史意义，内中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前瞻。在资料匮乏、信息闭塞和生活拮据的艰苦战争年代，能写出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乃至文笔俱佳的综述文字，不仅体现了王佐良的忧国忧民和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化观念，而且开始显露出他在驾驭与归纳纷繁多样的素材方面的过人才华。

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王佐良与在武汉已结识、当时就读于贵阳医学院的徐序女士于1940年在贵阳结为伉俪。在昆明，他们育有二子一女。

王佐良在翻译方面的最初尝试大约开始于1940年。虽然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清苦，工作繁重，经常还要在外兼职谋生，最多时曾同时干六份工作，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和翻译。早期译作有爱尔兰著名

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他曾托人带到桂林准备出版，不幸遇上日寇飞机轰击，手稿化为灰烬。后来仅整理出一篇《伊芙林》，1947年才得以登载于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同一时期他也开始了学术论著的写作，其中，《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一文，曾分章节载于《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今译名；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之先河。此间他还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诗作的研究，他关注着在延安的诗人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鲜活实验，热情地介绍和评论了在昆明的年轻作家群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诗人穆旦（查良铮）。王佐良撰写的原载伦敦《生活与文艺》的《一个中国诗人》（A Chinese Poet）一文，堪称为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佐良辞去在国际宣传处的兼职，举家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在清华继续任教。1947年秋，他考取了中央庚款公费留学，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Mer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生，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导师是著名的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学者威尔逊教授（Frank Percy Wilson, 1889—1963）。他充分利用了牛津大学学者云集、学术空气浓厚和文献资料丰富等有利条件，勤奋努力，广泛涉猎了英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不仅得以提前一年获得B. Litt. (Oxon)学位（即后来牛津重新颁发的Master of Letters—“文学研究硕士”），也为他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撰写学位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to 1830）时，王佐良按照导师的指点，充分掌握了有关这位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及其作品的丰富材料，包括各种私人抄本、剧本目录以至剧院广告，又详细参考了历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观众对他的作品的反应，用生动准确的语言阐述了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1580?—1632?）的文学成就，追溯出古代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诗剧的爱憎、迎拒的弧线，从中看出历代的风尚，并进而揭示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侧面。在二十多年后的1975年，这篇论文又由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Engl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Universität Salzburg）作为专著出版了单行本，成为

## 缅怀先师 THE MEMORY OF TEACHERS

该校编印的《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研究丛书》之一。此书受到国外行家的一致好评，他们不仅对文章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特别赞扬了王佐良把历来十分枯燥的考据内容写得生动感人的本领，说此书的文采“特别出色”，“它风格清新活泼，作者自始至终不失其幽默感，而且列举了许多有关所论时代的演出、研究和审美时尚的生动实例”。这种写作风格在他后来的其他文论中均有体现和发展。王佐良对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的研究为自己赢得了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声誉。

在英国留学并研究英国文学的期间，王佐良也从未间断过自己的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叙了乘船出国途经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开罗等地的观感，这些颇富文采的游记，曾陆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在结束了牛津大学的学业后，王佐良曾准备去法国继续深造，而这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远涉重洋，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回到解放后的北平与妻儿团聚。他在40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对记者说：“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和我一样，急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记得当时帝国主义对内地实行封锁，从香港乘船到内地有一定的风险，但即便是那样，我们也下决心要回来。说实在的，当时要留在英国也不是不可以的，而且生活也会很不错，但我们从未想过要留下，从留学一开始就认为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回国后，王佐良全家一直居住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50年代，家中又添两子。

经过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的短期学习后，王佐良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在该校工作直到逝世。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建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王佐良与他的老师金岳霖、钱锺书等著名学者一起被聘为委员，共同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翻译工作。

王佐良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努力，并得益于从中学起就受英语环境的熏陶以及在大学和出国留学期间众多中外名师的指导，他积累起了深厚的专业根底和广博的知识阅历，

这使他能英语教学中，较早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现代先进教学方法而广受师生的欢迎。在王佐良和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很快便成为我国水平最高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基地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已成我国外交、外贸、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骨干力量。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际上也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

为了适应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需要，王佐良潜心研究了英语语言学方面的一些课题，尤其是有关英语文体和风格。他在1963年撰写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提出了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建议。文中精辟地指出：

文体风格的研究是有实际用途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观察英语的性能，看到英语的长处、短处，以及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该特别注意或者警惕的地方。因为英语一方面不难使用，一方面又在不小心或过分小心的使用者面前布满了陷阱。对于英语教学来说，文体、风格之类最忌空谈，能否说出口语体、笔语体的名称或修辞格的定义，对于能否确切了解与恰当运用英语，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须具备有关文体、风格的知识，例如我们眼下的初年级教材着重选用能上口但又不过于口语化的文字，中、高年级需要有利于笔头模仿的各种实用文体（书信、布告、公文、特殊的报纸文体之类）以及一定数量的艺术文体。教师有一点文体、风格的知识显然可以选择得更自觉、更细微，自己编写起教材来也容易有意识地注意文体上的适应性。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对于处于提高阶段的学习者，文体、风格的训练能够帮助他掌握英语，但是这所谓掌握不仅是自己会说会写，还包含着对别人说的写的有确切的了解。真正确切地了解外语不是易事，造成了解困难的有许多因素，其中也有文体风格的因素。

当时即使是在英语国家，对英语文体和风格的研究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王佐良的这篇论文堪称国内系统地研究英语文体学的开山之作。在这前后，他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英语语言的论文，例如《现代英语的简练》（1957）、《英语中的强调手段》（1964）、《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他》（1978）、《现代英语的多种功用》（1979）等。这些论文在1980年汇编成《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繁重的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使王佐良只能利用假期时间从事文学翻译，他谦虚地自称为“一个业余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与友人姜桂依、吴景荣、周珏良、许国璋和朱树飏等合作，由英语转译出版了著名苏联作家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 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 рг, 1891—1967)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参与其事的还有王绍坊、陈体强、李赋宁、夏祖焯和梁达，可谓名家荟萃。这些译校者后来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或专家。此书虽从英译本转译，但风格上参考了法语的译本，疑难内容处还请人对照了俄语原作，体现了译者们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不过此后王佐良就没有再涉足过大部头的小说的翻译，而是精心翻译了为数可观的英语经典诗文和散文。50年代，他翻译的代表作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随笔》三篇，其中最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谈读书》的译文，已被同行学者们誉为“好似一座令后来者难以翻越的高高的山峰”的经典佳句：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同一时期，王佐良还为中国读者留下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脍炙人口的诗句译文：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谐。

1958年，王佐良与巴恩斯(Archie Barnes, 1931—2002)合作完成了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一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全剧剧本的英译工作。他们用生动、地道的英语准确地表现了剧中各角色的个性，出版后受到行家的一致赞扬。此外，他还将一些难度很大的汉语诗文翻译成了英文。

王佐良在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中的杰出成就，使得他在60年代间先后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市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大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时期，与许多同时代的著名专家、学者一样，王佐良也难逃一劫。早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澄清了的抗战期间的

一段原本是爱国行为的经历，却使他又一次蒙受“历史问题”的审查；他在英语界所处的位置更使他“理所当然”地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先是被抄家批斗，继而被发配到“干校”接受教育。但即使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英语知识作为一种既可用于国际交流，也可用于“阶级斗争”的工具，仍有其重要的使用价值。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外国语学院从1971年开始组织编写《汉英词典》。由于有了这个契机，仍在接受审查的王佐良有幸于1975年进入编写班子，并成为副主编之一(主编为吴景荣)。这本从中美关系解冻时开始编纂，到“四人帮”覆灭后的1978年面世的大型工具书是王佐良一生参与编写的唯一一部辞书。编纂辞书并非他的特长，但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中，能从事这样的相当专业的任务显然是十分宝贵的机会。王佐良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为了使每一个词条、释言和例句都能达到准确无误和鲜明生动，他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大量的查阅和考证工作，并尽力为参与编写工作的青年教师提供帮助。在总结编写这部词典的心得体会时，他说：“最终决定一部作品语言的好坏，以及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一部词典优劣的，不仅在于编著者对于某种表达形式的精通与否，而且还在于他对论及对象的敏感性，他的想象力，他的求知欲和对新生事物探索的勇气，他对人类事业的关注和他是是否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实际上，这种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和勇于求索、善于想象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了王佐良的一生。《汉英词典》以其丰富的内容、严谨的结构和准确的诠释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94年，商务印书馆已连续印刷15次，199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出版了它的增订版。这本词典的体例、词条和释义也为众多的后来者乃至其他语种的辞书所广泛模仿和引用。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王佐良的才华也得以尽情地发挥。1981年起，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该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文学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他还先后担任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 缅怀先师 THE MEMORY OF TEACHERS

王佐良在英语教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被清华大学等多所著名院校聘为特邀或兼职教授。他还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王佐良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中英文学交流奖评委会主任。另外，他还是《外国文学》、《文苑》杂志的主编，并兼任《英语世界》、《英语学习》、《世界文学》、《译林》等多种杂志的编委或顾问。

尽管身兼如此之多的行政和学术职务，王佐良仍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除了亲自指导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他还在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选编方面为我国英语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61年，他就为国家主管部门制定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选定了中英文的必读和参考书目，这个书目至今仍十分有用。从1980年起，除了传统的英语教学主流课程之外，他又领导一批中青年教师开设了一门用英语教授的专门课程，介绍欧洲各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史实，并与同一时期相关的中国文化现象进行比较。1992年，他和祝珏、李品伟、高厚堃共同主编，将讲授这门课程所积累的讲义和提纲等整理成英文的《欧洲文化入门》一书出版，得到全国各外语院校的欢迎和关注。1995年，《欧洲文化入门》获国家教委第三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此书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在频频再版。这一尝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佐良关于“通过文学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和“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有助于人的性情、趣味、美德、价值标准等的提高，也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亟须加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的一贯主张。

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充实了我国英语教材的内容。1987年出版的由他和丁往道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立意新颖，论述精辟，结构严谨，受到教育界的一致好评，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优秀奖及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学术界的繁荣。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以后，王佐良在英语文学、

比较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翻译理论等诸方面的学术思想也日臻成熟，他的写作热情一发不可收。从1978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他的专著出版，而发表在各杂志上的短文和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更是数量惊人。

王佐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向中国的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英语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作和散文。“文革”后，他先是主编了《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后来又和李赋宁、周珏良、刘承沛合作选编的《英美文学活叶文选》集录成《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3）、《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1994）等。在这些著作中，王佐良一方面亲自翻译了许多英语名著，另一方面还为他选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精心撰写了介绍和评述，使读者在欣赏异国诗文的音韵风采之余，还能了解到不少有关作者的身世和文化背景的知识。

王佐良在文学翻译方面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和《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等著作和许多论文中。他特别注重如何使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各种作品贴近读者的问题，一再强调“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他仍然继续谦虚地把自己的译作称为“试笔”，说“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他认为，翻译的理论不能永远停留在只是津津乐道于前人总结的“信、达、雅”三个字上，而应有自己的见解和创新。他自己的主张是：“一、辩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诗歌翻译方面，他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不论是翻译外国诗歌或中国诗歌，都不仅要在音韵和节奏等形式因素上接近原作，而且应忠实原作的风格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新鲜或气势”。他还特别强调，翻译中应注意处理好全文和细节之间的关系，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

于创新。他将开始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王佐良正是以这种“创造性的努力”的创新理念完成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的。

从上大学撰写英国诗人艾略特的研究论文和在牛津大学主修17世纪英语文学开始，王佐良一直在英国文学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并多有建树。进入80年代以来，他先后编著了《英国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中外文学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重庆出版社，1991）、《英诗的境界》（三联书店，1991）等著作，从多个角度介绍了英国文学和其他西方文学，以及编著者自己的研究心得。

其中，《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一书集录了作者在4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着意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用英文撰写的11篇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契合”关系。王佐良在这里着意使用了“契合”二字，既贴切而又形象地描述了各国异域文化和本国古今文化之间的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比较文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这些论文中，王佐良用堪称“高级英语读物”（评论者语）的优美文字，先是通过典型作品艺术性的分析来研究其思想性，进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坐标探讨了中西方重要文化运动和思潮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它们的消长沿革，从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来观察和归纳了它们的思想性内涵。《论契合》一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称赞它“用充实的史料有力地论证了2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对严复、林纾和鲁迅等翻译家的论述“非常精细”，对中国早期现代诗歌所作的研究“清楚地分析了每位诗人如何超越外国现代派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具有独特个性的诗歌”。该书以其新颖的研究方法、独到的见解和清新的文笔，荣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

王佐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英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很大的工

程，全书共分五卷，其中他和周珏良合作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一卷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与何其莘合作主编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一卷大部完稿。此外，他还为《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亲自撰写了有关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一章。

除了主编《英国文学史》这样大体量的综合性文学史以外，王佐良还编写了一些专题性的文学史书，如《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和《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4）等，其中，《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谈及“修史”这一十分严肃的工作时认为，编著者不仅要尊重史实，而且“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一个总的骨架；要有可读性”。他反复强调，“写外国文学史首先应该提供史实，以叙述而不是以议论为主”，要“有说有唱，说的是情节，唱的是作品引文。没有大量的作品引文，文学史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然而叙述中仍须有评论，所谓高明主要是评论的高明，特别需要的是中外诗文评论中常见的一针见血之言。”他还一再告诫说，文学史的“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套话术语，不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点文学散文格调”。

王佐良的上述认识和主张不仅体现在他的史论中，也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作为一位诗人和有大量译著的学者，王佐良作品中“鲜明的个性”就在于他力图用流畅精练、生动准确的语言来叙述事实和表达观点。他对英语文体和汉语修辞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使他得以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完成卷帙浩繁的文史论著的写作：他身体力行了“以诗译诗”的主张，又以散文笔法“说说唱唱”地叙述散文本身的流变；他的游记语言清新，他的剧评文采照人；即使是那些严肃深奥的文艺理论和历史沿革，经他娓娓道来，也毫无枯燥之感，读者在学到了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阅读的愉快”，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王佐良在谈到文风时认为，即使是学术论文，也应“写得短些，实在些，多样些，如果做得到，也要新鲜些”，要如实地记录下自己“所感到的喜悦、兴奋、沉思、疑问、领悟等等”，并应“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家圈子里的名词、术语”，“好的文学

## 缅怀先师 THE MEMORY OF TEACHERS

作品应该是能使人耳目清明的，论述文学的文章也应照亮作品，而不是布下更多的蜘蛛网”。这种用富有文采的语言来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践，是王佐良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改革和创新。

清新隽永的笔法不仅是王佐良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流露，也是他乐观、豁达性格的表现。虽然他的一生经历多有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他发表的包括游记、回忆、评论和随感等所有的作品中，却看不到那种怀旧、惆怅、伤感的语言，有的都是饱含希望进取的激情文字。正如他自己总结的：“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促进的。”这样的心态和气质在他晚年的一篇游记《浙江的感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文以灵动秀美而干净洗练的文字描述了由家乡风光引出的感悟：

杭州还有一个特点，即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山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抹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几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得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在王佐良逝世 18 年后，这一被评论者誉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范文被选入 2013 年北京市高考语文试卷中的阅读分析试题。

除日常的教学、行政工作和他特别钟爱的英语文学研究以外，王佐良更积极地参与了许多政治、社会活动。1978 年，他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并连任

至第七届。

王佐良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80 年，他应邀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客座教授，讲学三个月，开授了现代中国散文之风格和英美文学在中国两门课，分别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之时代风貌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与之互动并自我创新的情况，使听众印象深刻。1985 年，王佐良教授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Scholar），赴美 70 天，访问了普林斯顿、哈佛、麻省、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明尼苏达、密苏里等九所著名大学和三家特藏图书馆，进行研究和讲学。其间他应邀发表了九次学术演讲，主题包括“文学史的方法论”、“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英美文学在中国”、“文学教学问题研究”等。1987 年，他又率代表团访美，参加了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着重向国外学者介绍了他的力作《论契合》。此外他还访问了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爱尔兰等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讲学。他是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和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会会员，并被聘为英国国际教育指导中心（ICLE）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对西方文学及评论流派的变迁和英、美、澳等国文坛的动态了如指掌，并通过对外交流和与国内同行经常的讨论，不断充实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使国内外同行们加深了对中国文坛动向及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了解。

王佐良十分推崇“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他一贯主张，搞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固然离不开良好的外语能力，但首先要有坚实的汉语功底，而且还要尽量多掌握一些国内外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深刻地了解所涉及的作品的内涵，准确地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化，避免由于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背景知识而出现的常识性笑话。为此，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地“温故而知新”和接受新事物。王佐良自己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主张的，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外各种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著作，而且利用会议、视察、出访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了解多方面知识。在翻译作品时，凡遇到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他都虚心地向包括他的读者在内的懂行的人请教，汲取有用的营养。纵观王佐良的

许多评论文章，常看到他能在关键地方恰如其分地信手拈来一些源自生活的鲜活事例和中外名著中的恰当典故，又能准确流畅地翻译一些政治、经济、科技乃至军事等领域的术语和概念，使行家看后感到毫无别扭之处。王佐良在谈及他写作《英国诗史》的心得时写道：“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和发现的过程。经过这番努力，我发现我对于英国诗的知识充实了，重温了过去喜欢的诗，又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认识的好诗，等于是把一大部分英国好诗从古到今地又读了一遍。衰年而能灯下开卷静读，也是近年一件快事。”这本倾注了王佐良多年学习和研究心血的史书，在他逝世后不久被国家教委评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以工作为乐，同样是王佐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为了积蓄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他在青年时就喜欢打网球、爬山、游泳等多项体育活动，直到年近七旬，还可以时常骑车外出。在“文革”期间的“干校”里，他苦中求乐，饶有兴趣地记录了种菜劳动的过程和从中学到的知识，还为各种瓜菜标注了英语名称。晚年虽积劳成疾，罹患心血管疾病，又有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致使腿脚不大灵便的毛病，但他依然壮心不已，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病痛带来的种种不便，更加奋发工作。他曾说过：“年逾古稀，还能工作，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我的福气，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不得已。我总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作些贡献。尤其对我们来说，耽误了几十年的时间，就特别想把损失的时间尽量补回来。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快乐。”

然而，人们从王佐良那丰硕广博的学术成果和井井有条的工作安排上，也许想象不到，他与我国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在业务上常常要为自己规定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和不断地与疾病斗争以外，在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几十年来，自幼多病的四子几乎每个日夜都离不开二老的照顾；1983年的一次严重煤气中毒事故，又使他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徐序女士元气大伤，这都不能不给他带来众多烦恼，但他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奋笔疾书，忘我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竟有16部之多的专著问世，身后仍有几本书在印制过程中。使他感到欣慰的是，通过他与众多新老外语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水平日益提高，他自己的学生和子女大

多学有所成，所钟爱的孙女也步入了他曾为之奋斗毕生的英语文学事业。1989年，在有关方面的关怀下，王佐良全家得以从居住几十年的清华照澜院老房（《照澜集》即由此得名）搬迁至距离不远、条件较好的中楼新居，到了晚年终于又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他着实高兴不已。与在50年代翻译《彭斯诗选》时与妻子徐序分坐在一张圆餐桌两侧，他译，她抄，并共同讨论的情景相比；与70年代在老宅的一隅与孙女轮流共用一张折叠书桌的情景相比；与曾经吊着伤臂坐在马扎上、伏在板凳上写作的情景相比——他已感到十分满足了，这也许是对他毕生奉献的一点回报吧。他身后出版的《中楼集》便是在这间书房里创作的。

1995年1月17日，北京《读书》杂志社主编沈昌文到王佐良寓所代取他应台湾《诚品阅读》杂志之约撰写的《谈穆旦的诗》的文稿，并送来了他想阅读的金庸所著的丛书。不料，这篇为台湾读者撰写的评论文章竟成了他的绝笔。当天，王佐良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月19日晚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王佐良的逝世震动了中外英语文学界和有关方面。国家教委、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等有关部门、院校和单位，纷纷派人或致电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通讯社和报刊都发布了消息、讣告和悼念文章。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王佐良遗体告别的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夫妇、爱尔兰驻华大使和在美的友好人士等一大批生前好友发来了唁电。人们用汉语和英语中各种美好的词语和崇高的称谓衷心表达了对这位蜚声中外的一代大师的怀念之情。

1995年2月9日，王佐良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本文摘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官方网站纪念王佐良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专题网站）

# 在炮火中高歌

——访前驻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

童峻



### 人物简介：

潘占林，1942年出生于黑龙江。曾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巨变。历任我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南斯拉夫和以色列大使。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

1999年春季一个宁静的夜晚，潘占林漫步在使馆大院。阴雨过后，万分沉寂。不闻往日飞机的轰鸣，也不见导弹的火光。“忽然，从树丛中，传来夜莺的鸣啭。”——此情此景，让潘占林的心不自觉地为之颤动——他在日记里写道：“呵，战地夜莺，在多少炮火轰鸣的夜里，剥夺了你的歌声。”

一年前，刚从乌克兰卸任的他来到新贝尔格莱德樱花路3号。在这里，潘占林目睹了南斯拉夫民众的生活因战争变得每况愈下，也亲历了中国使馆那场惊动世界的浩劫。无情的炮火吞噬了使馆三位年轻同胞的生命，将战争的恐怖赤裸地摆在眼前。来不及害怕与伤痛，在南逗留的八千华人意味着他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这个夹杂着恐惧、悲愤、彷徨、决心与力量的事件——不仅是令潘占林大使此生难忘的一刻，同时也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从而进入公众的视线。是什么给予他力量？他如何面对生命里的抉择？如何理解他所观察的这个世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访谈开始了。

## “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潘占林的家乡就像是端木蕻良笔下“在晨风里颤抖”的大地，“一垄一垄的折成皱纹，波涛冉冉的汹涌”。也正如流浪者萧红所描述的，那里有宽阔的土地、充足的粮食，“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

黑土地广袤而美好的意象往往存在于文学和怀旧之中，而现实却充满了更多的艰辛与局限。1942年农历九月初九，潘占林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郊区。“那个地方就是穷乡僻壤，很闭塞。”潘占林不时地强调“农村”这个词，“也比较愚昧，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就是好好念书，将来做点事吧。”

到了农忙时节，潘占林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就放下手头的功课，跟着大人们到地里干活。夏天的大雨过后，杂草长势迅猛，都快要淹没了庄稼。这时，由小孩来帮忙除草是很自然的事。到了秋收时节，他们就帮着一起收割庄稼。

忆起父母亲，潘占林说：“他们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正如电视剧《闯关东》里刻画的踏实肯干的拓荒者，他的父母分别从河北和山东过来，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落下了根。民国年间，“闯关东”洪流澎湃。河北、河南、山东等关内地区旱涝灾害频发，农民靠天吃饭，生计成了问题。他们憧憬东北广阔的土地和殷实的粮仓，还有人想到东北淘金。那时候，齐齐哈尔的很多地方都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有人力和畜力，就可以去耕种。虽然他的父母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金矿，但是他们寻得了一块只要努力耕种就会有好收成的土地。

拓荒者的艰辛不言而喻，但他们的希望同样坚不可摧。“我父亲那一代人要吃尽千辛万苦，最后才能够成家立业。”潘占林的脸上显现出严肃而又坚定的神情。他的父亲在铁路上打过零工，在大车店里打过更，给地主当过短工、长工，几乎什么辛苦的行当都干过。潘占林说：“他们那一辈就像《闯关东》那个电视剧（里的人），那个就是真实情况。”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但小学毕业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你们能念，你们就念。”

农村的教育条件比较差，升学率低。潘占林所在的六年级班有四五十个人，最后只有四个人考上了初中。到了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淘汰了。家里一共五个孩子，只有潘占林和他的姐姐顺利地考上初中，最后成为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尽管当时上大学可以领到助学金，供养两个大学生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决非易事。为此潘占林节衣缩食，刻苦学习。

## 擦肩而过的“作家梦”

“当时我喜欢文学，将来想当个作家。”潘占林语气平和地说，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欣喜。

中学时，他的功课不错，特别是在写作上，他经常在学校的征文比赛上获奖。高考时他填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惜没有考上。潘占林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自己的修养还不够”。1960年，他进了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开始学习俄语。

潘占林没有什么心理落差。“学外语也可以，将来呢搞文学翻译。”他心里琢磨着，“当翻译家也可以，跟文学也是相近的。”况且，上大学的机会太难得了。

在黑龙江大学的四年时光里，他沉浸在由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大家所构筑的苏俄文学的世界中。大三假期，他一口气啃完了《战争与和平》。从这部1400多页、俄文字数达46万的史诗巨著里，他领略到俄国的人情世故，也感受到了历史的沉重以及战争的残酷。

通过阅读富有高度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苏俄文学作品，潘占林在提高自己俄语水平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了解。他从那些反映人民疾苦和贵族阶级腐败堕落的文学作品里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子。他觉得，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笔下那些“多余的人”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时代转换、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彷徨、凋敝，在社会上没有了着落。

“（俄罗斯人）谈起任何问题你都知道，他引用的哪本书、哪句话你也知道。”潘占林回忆起他在苏联使馆的工作经历，“真的。他们电视上搞智力测验，我都能了解其中的内容。”

大学期间，绝大多数的时候，潘占林都在心无旁骛地学习。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心一意地学习，从早到晚地学习”。每逢周末，家在哈尔滨的同学都回去了。潘占林在学校闲着，也只好看书了。考虑到学校致力于培养俄语师资，潘占林心里抱着一个单纯的念头：好好学，当上了教师，业余时间还可以从事翻译。

四年级上学期，外交部来黑龙江大学选拔人才。彼时，潘占林已经报考了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系的研究生。已经领取准考证的他心里想，“这次肯定能考上了。”即便如此，“心有所属”但成绩优秀的潘占林还是被“盯”上了。有一次，赶上外交部干部司的人过来听课，任课老师故意喊潘占林起来

回答问题。课后，辅导员找到潘占林，对他说：“你研究生不要考，将来到外交部工作。”

回忆起那个抉择的时刻，潘占林泰然自若地说：“当时心里挺平静，到外交部也可以，考研也可以。”

他在黑龙江大学所修的课程与外交的关系并不大。他只知道，如果去北大读研究生，毕业了兴许能当上教授，既能翻译俄罗斯的文学，又可留校；而教授的职业既稳定又清闲。他想象不到当外交官的感觉是怎样的。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北京仿佛是座遥远的城市，外交官则是个神秘的职业。

他解释说：“当时就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如果您当时知道外交官的情形，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不禁问他。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潘占林放声大笑。

### “将来可能要干外交这一行”

直到进了北外的俄语翻译班后，潘占林才强烈地意识到：“将来可能要干外交这一行”。

1964年，他来外交部干部司报道。当时，外交部准备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培养一些储备干部，因此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了英文翻译班和俄文翻译班。翻译班学制两年，学员毕业后相当于研究生学历。

在进北外的翻译班前还有一场选拔考试，由杨作仁和高明监考。潘占林至今还记得这两位俄文出色、境遇各异的老师。杨作仁曾是国民党政府苏联领事馆的武官助理，还在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当过编辑。文革风暴尚未席卷校园时，他就去世了；高明从小学习俄语，在哈尔滨的一所苏联中学念书。文革后期，他被红卫兵抓起来隔离审问，最终跳楼自杀。“他们称他为苏联间谍。”潘占林惋惜地说，“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一个老师。”

所幸，潘占林在北外的两年没有被文革的喧嚣所吞噬。从苏俄文学到国际政治，潘占林努力去适应这个转变。翻译班里有十个学生，三个女生，七个男生。大家学习都很优秀，有来自北大的，也有本科就是北外的。尤其是那些北外的同学，他们以前就经常接触外文报刊和外交类书籍。这让潘占林意识到，大学四年学的知识还远远不够。

上课时，老师会复印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带领大家阅读。语音教学的形式则是老师念一段文章，由学生来翻译。后来为了练习听力，系里专门给学生

买了一台收音机，用来收听俄语新闻，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优厚的条件。在杨作仁、高明、武秋霞和李莎等老师的启发下，潘占林的语言功底变得更加扎实。

在北外读书期间，潘占林还出了一趟远差。有一年，中国共青团副书记带领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由潘占林担任翻译。“为什么选我，也说不上他们怎么想的。”他解释说。由于准备充分，潘占林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外交实践。同时他还体会到，从事外交工作不仅外语水平要高，而且要懂很多其它方面的知识，比如历史、社会、文学、哲学等等。

他说：“知识要渊博，要样样通才行。”

这样看来，潘大使离他少年时代的“作家梦”仿佛渐行渐远了。在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没有翻译过一本成本的文学作品。他一直坚持认为，身为外交官最好不要去做这些业余的事情。“一心不可二用。”潘占林说，“如果脑子里经常想着书的翻译，你很多外交上的事情就做不好。”唯一的例外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邀请，他翻译了1947年苏联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谈话录。“其它的（翻译）就是要着玩的，不算数。”他爽朗地笑道。

### 牛田洋的插曲

牛田洋是许多40后外交官的共同记忆。

1998年7月，李肇星在美国巴尔的摩写下诗篇“我们共同的牛田洋”。在诗里，他写道：“……虔诚的是我们年轻的一群。用热泪拭擦面颊，用冷汗沐浴身心……我们的牛田洋，永远的一瓣心香。你是意志和理智的课堂，你是承前启后的力量。”

潘占林本该在1966年就从北外毕业了。不料，当年二月份，中央委派外交部的干部下乡参与“四清运动”，潘占林和同学被派往江西。然而，到十月份他们返回北外的时候，文革已经在校园里开展得“风生水起”。在时代的大熔炉里，青年是渺小的。潘占林说：“我们在那基本上搞了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吧。”

1967年6月，潘占林终于走进了外交部翻译室。当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同苏联往来渐少，除了照会没有多少文件需要翻译。1968年，毛泽东指示知识分子应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当年九

月，经过很短一段时期的培训，外交部的青年干部们浩浩荡荡地向汕头进发。

“到牛田洋是9月11号。”潘占林记得很清楚。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11点，一路舟车劳顿的学生们在睡梦中被摇醒。大家被紧急集合，要求学习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新指示。

牛田洋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外交部有一批干部在那里开垦土地种植水稻，条件十分艰苦。大田不用牛耕作，也不用拖拉机，只靠人力拉犁拉耙。部队官兵和学生们用汗水将它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大型农场，并用生命去保护这片新开垦的土地。

1969年7月28日那天，一场12级以上的超强台风以每秒53米的速度席卷汕头。驻守牛田洋生产基地的官兵与在该基地锻炼实践的2183名大学生，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暴风潮的战斗，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在抢险中献出了生命。潘占林班里的两位同学也难以幸免。

潘占林在西牛田洋8342部队的营部里负责撰写报道，给报纸投稿反映部队生活。在距离营部八九里地的莲塘村，台风掀掉了粮仓的房盖。于是，营长让潘占林和宣传队的人员去帮助当地老百姓撤离并修建粮仓。潘占林说：“还好没有掉在水里，因为我不会游泳，落下水就回不来了。”

后来，外交部因缺少人手，决定接潘占林他们回京。没想到部队却看中了他们这些年轻的劳动力。

“我们还得重建牛田洋啊，这些学生都二十来岁，特别能干，比那些战士还能干活。”潘占林记得部队的人这样说过。为了修补大堤，学生们在水田里把泥土踩成一坨，抱起来放到船上，再运到岸上去。有时候，学生们甚至一直劳动到晚上12点。虽然是在南方，12月的水田依旧冰冷刺骨。经过长时间的日夜奋战，大家终于把大堤修好了。

牛田洋重建工作结束后，部队却还想留下学生帮忙种植水稻。所幸，在外交部的强烈要求下，大家终于在次年1月被“释放”了。

“我们牛友现在还经常一起聚会呢。”潘占林饶有兴致地说，“我们这些学生都算牛友，你们知道的就像李肇星，他是在炊事班当班长，陈健也是。”

## “需要耐心的工作”

从1970年到1992年，潘占林曾先后三次远赴苏

联使馆工作。他经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见证了中苏关系从恶化、破裂又回到正常化的历程。二十多年里，他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学生成长为耐得住寂寞、顶得住风浪的外交官。

“我是70年8月1号结婚的，”潘占林说，“结婚以后我就去苏联了。”

1970年夏天，外交部决定派遣潘占林去苏联使馆工作。当时中国外交官尚不能携带家属，整个苏联使馆只有一个女干部，因此得名“和尚庙”。

“和尚庙”里事情多，潘占林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小心翼翼地积累着经验，也吸取着教训。起先，他在使馆的对外部门工作，负责安排外事活动。有一天，部门收到一张来自越南南方使馆的请帖。潘占林正准备往活动日程上登记时，领导让他出去送材料，于是他就把请帖搁在桌上了。等他从外头回来时，同事已经把请帖放到别处去了。事情一多，潘占林就忘了这件事，而受邀的一等秘书并不知情，便没有前去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在现在看来，这个活动出不出席有什么不得了，就一个小活动。”潘占林说，“但是当时跟越南关系特别密切，我们支援南方的抗美救国斗争，所以你不出席活动那就是一个错误啊！”因为这个过错，潘占林还特意写了份检查，在此基础上使馆又写了一份。“从那以后，我做什么事都思前想后，不能马虎。”他补充道。

刚刚踏上外交战线的潘占林很快悟出了两个道理：第一，学以致用，外语要和当时的实践相结合；第二，外交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一环扣一环，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比如说大使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准确的时间、地点得告诉司机，也得告诉大使。”潘占林说，“另外，这个地方在哪里？司机知道不知道？如果不知道，还必须叫司机亲自去看看。司机如果不懂外语，你还必须带他去看，到时候就得准确地拉到那个地方。”

后来，潘占林进了使馆的研究室，从早忙到晚。彼时正值苏联变革的时代，国内对苏联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研究员每天有大量的报刊要读，还要关注广播电视并且出去走访。“我每天要上三个班，”潘占林打趣地说。上午八点到九点，他先把报刊看一遍，然后向不懂俄语的党委干部汇报新闻。他还有一份调研任务，有时候大使出去，需要他帮忙做翻译。到了晚上，大家就聚在

会议室看电视新闻。此外，潘占林还会接着翻阅许多白天没看完的报纸，在此基础上汇总信息。

苏联的外交牵涉到整个世界的形势。由于长期在这个超级大国从事调研工作，潘占林发现自己的眼界渐渐地开阔了。在外交工作中，他不仅重视苏美关系，而且重视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而研究室里这段“朝八晚十”的岁月让他为迎接外交生涯中的诸多挑战做好了准备。“逐渐对外交、对调研这些东西变得比较熟悉，”潘占林说，“可以说路比较熟了吧，在业务上能胜任。”

1992年，潘占林开始担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任大使。

### 战火中的电话

1999年3月的一天，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水泄不通。大厅里、走廊里挤满了前来参加吹风会的华人。“风声紧，雨意浓”——潘占林大使引用《沙家浜》的戏词向大家形容当下的形势。

战争一触即发。拥有强大军事力量、预谋已久的北约必将使南斯拉夫遭受重创。为了确保在南华人的安全，潘占林建议大家去邻国暂避，如果留在南斯拉夫，则须采取防范措施。吹风会后，有一些华人离开了南联盟，但也有一些人不忍心放弃宝贵的商机选择留下。他们将与南斯拉夫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3月24日，距离开战还有七小时。潘占林决定把使馆的非急需人员撤离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其中包括他的夫人兼撤退人员的领队申雪茹。下午两点，当车辆缓缓驶出使馆大门的时候，潘占林与撤退人员挥手告别。此时，他的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尽管撤离可以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但是他们何日得以返回却是悬在他心头的一个疑问。此刻，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也正同她的儿子挥手惜别，目送他远离这个炮火随时横飞的国家。

下午4点左右，使馆车辆离开南斯拉夫国境……5点，车辆到达罗马尼亚的一个边境城市……晚上8点15分，贝尔格莱德上空响起空袭警报……潘占林坐在使馆的传达室里，细细地盘算着，神态凝重。终于在8点30分，包括外交官和司机在内的护送人员安全返回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警报响

起后，街上的行人都匆匆赶回家中，商贩们也提前收摊。在商店橱窗的电视前，一些人正在收看北约空袭的新闻。不一会儿，潘占林就听到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突然间，烟云火光冲天而起。此时，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军用机场已经遭到轰炸。

大约晚上12点，潘占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官邸。正当他静下心来整理思绪时，电话铃响了。他忐忑不安地拿起话筒——

“爸，今年是1999年，你又是9月9日生日，这么多9碰在一起，不吉利，你得多加小心……”电话的那头，从来不掉眼泪的儿子声音已经哽咽，“炸弹是不长眼睛的，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潘占林说了些宽慰的话，让他放心。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感到惊奇。知道官邸外线电话的人不多，而且轰炸开始后一切有线联系手段都已断绝，外面很难打进电话来。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他和申雪茹也从未接到过儿子的电话，平日里都是夫妇俩给他打电话。而为了打通这个电话，儿子试了一晚上。

“使馆人员两年休一次假，平时有空写信，当时没有电邮、短信这些东西。”谈起驻外岁月，潘占林笑了笑，接着说，“就这样，当时就是背井离乡。”儿子倒也从来没跟父亲说过抱怨的话。令潘占林庆幸的是，在儿子成长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并没有缺席。“他从六年级到中学，中学考大学的时候，我都在家。”

小时候，儿子崇拜夫妻俩的职业，还说长大后自己也想当外交官。等到儿子懂事了，潘占林却被告知：“你们这个管的太严，什么都得汇报，不想做这个……”

“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很纠结的，”潘占林说，“但当时因为有需要，有热情，一天大堆文件，有使命感！”

一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入侵行动已经展开。而“使命”二字，如同照亮贝尔格莱德夜空的炮火，在黑暗的时刻迸发出耀眼而炽热的光。

### 夜莺 · 火球

从3月24日到6月10日，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一共持续了78天。

也有那么几天，飞机不飞，导弹不投。在一个雨后的夜晚，潘占林正在使馆院子里散步。忽然，

从树丛里，传来了夜莺婉转的歌声。

这让他不由地回忆起孩提时代偶然听到的果戈理的配乐小说《五月之夜》。在《战火中的外交官》一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在那月色溶溶的夜里，树影轻轻摇曳，小河在如银的月光里波纹微漾，清丽的夜莺的歌声，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婉转低回，有时似悠扬的赞歌，有时似深情的倾诉，有时似如梦如幻的浅吟低唱。歌声在这光与影的交辉中回荡，和夜色汇成奇异曼妙的交响乐。”

“我被震撼了，”他说，“第一次感到文学的魅力是如此强劲，它有摄人灵魂的力量。”

80年代初，潘占林还在苏联使馆工作。也是在一个春日的深夜里，他拖着满身的疲惫，从办公室来到使馆的院子里散步。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夜莺的鸣啭。夜莺的歌声“仿佛一双神奇的手，轻轻地拂去疲劳”，潘占林顿觉浑身轻松了不少。后来，他和几位同事还用录音机把夜莺的鸣啭录下来，在空闲时播放。有一次，就在杨守正大使宴请宾客的时候，孔雀厅里突然响起了夜莺的鸣啭。客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得知个中奥秘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齐声称赞杨大使的“奇思妙想”。

而此刻，潘占林却感觉到夜莺的鸣啭和以往有所不同了：“这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栗，带着胆怯，昔日欢乐流畅的旋律变了调，鸣啭中带着某种悲怆，也似带着对这个莫名其妙世界的思索，带着对人们遭遇的怜悯。”

潘占林不仅听到了夜莺的颤栗，更看到了人心的悲怆，以及悲怆背后的希冀。走在大街上，他看到人们的脸上少了笑容，蒙上了阴雨的寂寥。他看到集市上尽管秩序如常，却已经没有欢声笑语。他还看到，到市场上买菜的妇女们不忘买上一束丁香花带回家里。

“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潘占林发出这样的感叹。

使馆的同志们逐渐对轰炸习以为常，有的甚至想观摩一番。每当轰炸开始，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开始打炮，大家便纷纷向楼上跑。潘占林始终记得这样的画面：北约的战机在高空犹如一颗飞速划过的流星，而南联盟防空的炮火酷似从地面向高空飞腾的小火球；小火球接二连三地奔向那颗流星，但始终达不到流星的高度；小火球纷纷陨落，流星继续向既定目标飞行。不一会儿，他看到飞机投弹爆

炸产生的火光和烟尘，同时伴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楼顶的“观战”像这样持续了数次。直到有一次，一枚巡航导弹从低空曳着火光呼啸掠过，仿佛就在头顶，在场的馆员纷纷卧倒。从那以后，潘占林要求馆员不得到楼顶“观战”，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由炮火点缀的夜空是险恶的华丽。谁能想到，这个捣乱楼顶“观战”的巡航导弹意味着什么？谁又能想到，堂堂世界大国的使馆会遭到至少五枚导弹从不同方位的直接轰炸？

## 黑色星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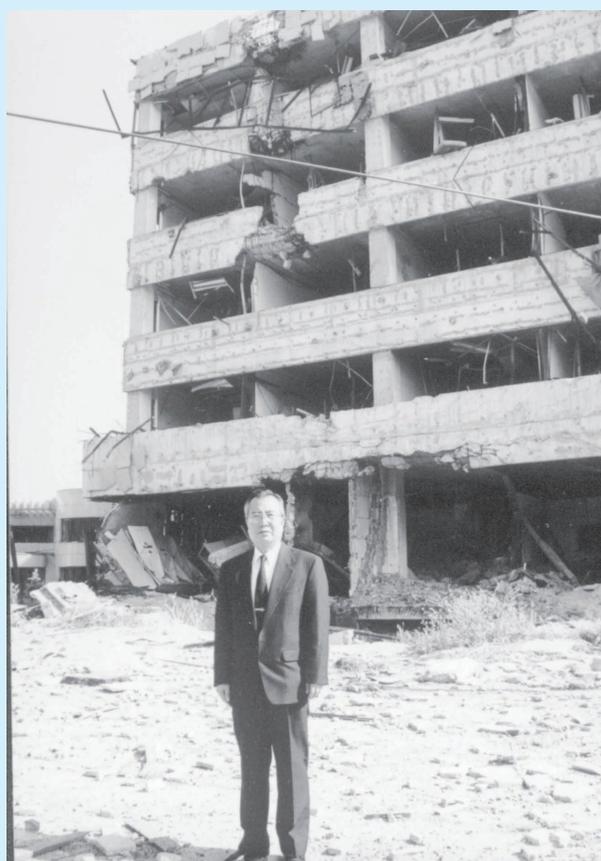


图1 潘占林在已被炸毁的中国驻南使馆前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当地时间晚上11时45分左右，至少五枚近一吨重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导弹划过漆黑的夜空，穿透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并夺去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夫人朱颖三条年轻的生命。

导弹撞击使馆的那一刻，潘占林在床上被颠了起来。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响声。“天崩地裂，地动山摇，”他说，“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

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慌乱间，他无力寻觅妻子的下落。厨师老王直接被震到了床下，直到他回国检查身体时，才发现断了三根肋骨。这一晚，使馆一片狼藉，有20多人在轰炸中受伤。

也许是由于平静之下的忧思、偶然之中的必然，如果不是因为当晚潘占林的一句话，恐怕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

自开战那天起，从早到晚的轰炸让整个使馆感到无比压抑。有的馆员甚至出现了“轰炸综合症”，白天工作累，晚上又睡不着。潘占林鼓励大家说：“人家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们照样也可以。”战争期间，他经常冒着炮火出去拜会南斯拉夫官员以及别国大使。

馆员们先前虽然没有预料到会有生命危险，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他们外出采购食品、蔬菜，也时常遇到轰炸。断电、断水给使馆的运转带来了挑战。虽然有发电机，但为了节省柴油，使馆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电。为了应对经常停水的情况，大家把大盆小罐都储满水，并且尽量减少洗澡的次数。在高强度的轰炸之下，他们也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使馆那间有一半窗户暴露在地上的地下室一度成了使馆的防空洞。每次警报响起后，他们就带着书报、案卷，来到地下室继续工作。有的人还在地下室放置铺板，随时准备在那里过夜。

5月7日晚上，有二十余人在俱乐部，也就是地下室的食堂里休息、娱乐。他们或打台球，或玩牌，或下棋，或玩麻将。正当大伙兴趣正浓时，灯突然熄灭了。大家打着手电筒，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潘占林正在院子里散步。这时，研究室主任王辅国走过来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嘛关掉发电机？”

潘占林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他对大伙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大使发话后，馆员们聊了几句，而后纷纷散去。

潘占林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了大使官邸。他点燃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翻开一本书……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这时，使馆大楼已是浓烟四起，烈火熊熊。

潘占林的心情震惊，沉重，焦急。外交部领导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

他站到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对楼里正在寻找出口的馆员们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大约凌晨5点，馆员们迁至凯越旅馆。潘占林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

他还来不及给家里打电话。此时，国内已经弥漫着莫大的悲痛与愤慨。

5月17日上午，潘占林带领坚守岗位的使馆工作人员来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公楼前。断壁残垣前，他们衣冠整齐，站成一排，升起五星红旗。

### 友谊无国界，和平须珍惜

炮火无情，九死一生。潘占林的外交生涯显得尤为惊险，但他却反复强调两点。首先，外交工作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其次，无论在哪里，外交工作都有其共性。具体来说，一是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二是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苏联使馆工作的十余年里，他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友好、紧张和对峙。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友好睦邻关系和战略协作关系对两国人民是最有利的。而南斯拉夫的劫难更令他无比珍惜和平与友谊。

潘占林认为，尽管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成功的访问可以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这就像走亲戚，”他说，“经常来往的话了解比较多，关系会密切一些。”

到如今，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已逃至俄罗斯避难，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死在荷兰海牙监狱里，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也卸任了……以往身居高位的各国领导人各有不同的结局。在这些国家担任大使期间，潘占林都尽力地与他们交朋友。

他对吉尔吉斯的“中国通”叶辛钦佩有加。叶辛曾担任吉尔吉斯东干人协会的主席、前总统阿卡耶夫时期第一届议会的议员以及中国问题的经济顾问。他出生在中国，后移居到吉尔吉斯。多才多艺的叶辛还是吉尔吉斯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的院长。

他小时候在中国学过武术，还是散打九段。所以，在吉国电影的武打场面里见到叶辛的身影也就不稀奇了……

提起印象中最有个性的朋友，潘占林首先就想到了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他对这位生于1923年的政坛“常青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开明”“讲话很少拿稿”“对人很热情，尤其对中国人很友好”。佩雷斯经常接见来自中国的访问代表团。2003年11月，潘占林从以色列离任回国前，佩雷斯还代表以中友协为他饯行。在巴以问题上，佩雷斯是倾向以土地换和平的和解代表。

他和今年七月刚去世的以中友协主席泰迪·考



夫曼互称“老乡”。考夫曼是出生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于以色列建国初期回归，是以中友好协会的创建者之一。逢年过节，潘占林和他都会互通打电话。最近，他正准备撰文怀念这位老者。

今年夏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袭击。一位以色列朋友曾经给潘占林打来电话问，“你有事没事？”在潘占林看来，平等待人、不居高临下就是朋友，而文化间的交流也是一样的。

图2 2003年11月13日，潘占林大使拜会以色列总理沙龙

他曾在耶路撒冷老城流连忘返。这方面积仅为0.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世界三大宗教文明的源泉。这里有犹太教的圣殿山及其西墙，基督教的圣墓教堂，以及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整个耶路撒冷旧城由4个区域构成：穆斯林区、基督徒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在这里体验宗教文化，就像走了不少世纪的路。”潘占林说，“尊重和了解每个宗教，到当地就尊重当地的文化。”

谈及中外交流，潘占林言简意赅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据他了解，在以色列有一些年轻的退

伍军人拿到复员费便来中国旅行。有的在中国呆上两个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玩个遍，而文化间的偏见往往就在交谈和旅行间消弭了。

他认为，有人提起“文明的冲突”，是因为世界上尚有一些不太文明的国家在制造冲突。潘占林说：“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是有差异的，但都可以求同存异，和平相处。”

只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才会真正认识到和平的可贵；只有在战争条件下生活过的人，才刻骨铭心地知道和平是什么，而战争又意味着什么。

在潘占林大使的心里，夜莺的鸣啭也许不再天真悠扬，但经炮火洗礼之后，它的歌声会愈加高亢，即使带着颤栗，即使隐痛尚未褪去。

## 结语

笔者：“在您去过的国家当中，您最留恋的是哪个？”

潘占林：“最留恋是自己的国家。”

笔者：“外交生涯带给您个人的收获是什么？”

潘占林：“了解外部世界，同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

### 奋斗与机遇

#### ——访张文梅校友



人物简介：

张文梅，1990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士学位，199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2006年就读于EMBA-RUTGERS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中国分校)。历任包头市第三中学英语教师，中国包装总公司、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翻译，荷兰MIH集团MIH项目经理、Mindport销售行政管理、Irdeto北京代表处行政和翻译，NDS公司总监，韩国Dreamer-i北京代表处总监，美国哈雷国际控股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爱立信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

何为成功的要素？奋斗和机遇经常成为辩论的两个观点。平生奋斗却未成大器遗憾终身之人不少，总是放过眼前机会无力挽留日日悔恨之人颇多，若要讨论二者谁更重要，那真是缺一不可。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张文梅特别的人生经历，一探奋斗与机遇并存的成功之路。

### 遇见北外

张文梅与北外的相遇是特别的。80年代，张文梅还是一个中学英文老师，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国家教委特殊项目，国家教委为各地中学老师安排就读后期本科的学校，而北外就是被指派的学校之一。当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每个省只有十二个名额，首先，入选者需要达到一定的教学年头，再经过层层选拔，最后由北外的教授进行省级考试。从事老师工作后还保持着强烈求知欲的张文梅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通过了考试，获得了来北外学习的机会。她和这些同为老师的同学一起相聚在英语二系，度过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来北外之后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张文梅回忆说，在当时的年代，大多地方来到首都都会有这种感觉，再加上北外有着不一样的清新的氛围和学识的沉淀，使得当年初入北外的张文梅对北外产生了如此的向往。首先，是这里的良师，张文梅总能看见学富五车、令人不由心生敬畏的许国璋

教授在校园门口的小摊前与摊贩搭话、与学生平易近人交谈的样子，这可是外语教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啊！她犹豫再三终于有一次鼓起勇气和许国璋教授搭话并表达了自己的崇敬，许国璋教授亲切地和她交谈，鼓励她努力学习继续读研。“还有胡文仲教授，他做了最早的电视英语教学节目，在北外校园内看见他儒雅的身影，有一种看到真人的震撼感。这么多有名的老师都在这儿了，北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时至今日，张文梅也为北外强大的师资力量自豪。不只是这些名师，还有早年国内大学比较少见的外教们，在北外的第一年，张文梅第一次过圣诞节。当时，外教和留学生会组织圣诞活动，他们自己出钱布置，买一些零食发给大家，大家能感觉到外国友人对圣诞的重视和乐于分享节日喜悦的心情，这些都让张文梅真切地体会了与书本不同、不一样的外国文化。当然在对北外的回忆中，优秀的同学们也是让张文梅一提到就赞不绝口的，来北外就读的机会成就了身边很多同学的成功，有成为创业大亨的，也有成为教育先锋的，在北外的学习生活给了英语二系的同学们更多的选择，张文梅也不例外。而这些，都是当初他们能够把握机遇，经过努力又创造的新的机遇。

### 生活充满困难与挑战

在进入北外前，张文梅曾经有过四年担任中学

英语老师的经历,而这四年养成的兢兢业业,有条理,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也为她今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结束学习和研修后,张文梅进入了Irdeto公司,当时张文梅的女儿仅两岁,丈夫赴日读博,家庭成了她不小的负担。不仅如此,Irdeto公司北京代表处刚刚起步,仅五六个人要运转一个分公司,人手不足是个大问题。由于人少,几乎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公司的所有工作,幸而大家没有什么抱怨,团结协作,让公司慢慢走上正轨。“国外那边要看业务业绩的,这份工作既是经验的积累也是一个挑战。比如一次大型展览会的策划,从展品到小物件的摆设,包括端茶倒水乃至发展潜在客户都是要做到的。”这段不同寻常又充满忙碌的时间让张文梅对公司运转有了一定的了解,也锻炼了她多方面的能力。

之后在NDS担任总监的工作期间,张文梅因优秀的工作业绩,被选做储备人才,由公司提供全额学费获得了在新泽西州立大学(中国分校)的进修机会。平日工作,周末上课;同学大多都是外国人,全英语纯外国式教育和讨论式课堂使得再次进入大学的张文梅又继续了进一步的学习,对外国文化有了新的了解。当然,这段时间非常辛苦,要做到工作与学习并重,少不了付出自己的休息时间、与家人的休闲时间,但也因此张文梅的阅历还有英语能力又得到了提升。

2008年,张文梅被猎头公司推荐去了广电行业家喻户晓的哈雷公司,她优秀的业绩和丰富的经历在面试时被哈雷公司亚太区的香港老板看中,被任命为北京代表处总经理。90年代电视数字化后崛起的哈雷公司主要负责搭设前端设备,为业内所熟知。当时国内的同行业供应商还处于发展阶段,初见哈雷公司的蓬勃发展和先进的技术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期,张文梅在公司主要负责销售方面,她需要重新组建团队,了解新的领域,不断打拼,开辟新的客户,本着不服输和努力奋斗的精神,张文梅敲开了北京歌华的大门,成功拓展了新的市场。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世界上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只是看你是否具备走进的能力和胆量,而这全靠你的努力。以门外汉的身份进入了广电领域的张文梅证实了这句话。接下来她又就职于涉及业务更广泛的爱立信

公司。爱立信公司下设媒体部门和广电相关等等,而张文梅作为大中华地区的副总裁上任后,她所面临的任务和全新领域带来的挑战更是接踵而来:“更庞大的客户群,社交范围、政治地位的提升和更加宽阔的视野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专业领域,张文梅一路都在学习,每一次转身对她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当然,在不同国家的公司工作,不同的文化背景也给张文梅带来各式的体验。举例说:韩国公司总体来讲和中国公司还是有很多相同文化的,比如餐桌文化和饮酒文化。再如欧美的公司,他们的计划性很强,有着长久的规划,要求公司作出对未来的预测并且有确切的数字要求。发表观点和讲PPT时,主要是预测市场状况,作出风险规划,判断可实现性。“这些都与教育方式相关。很典型的例子:中外料理方面,外国精确食材用量,中国却喜欢使用适量、少许等词汇。”

## 努力一点,学无止境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一定要学习,不然就会被淘汰。”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当代社会,张文梅在感叹自己一路艰辛走来之余,也在朋友的民办学校为孩子们做过讲座。对着那些高一高二、对未来有着迷茫的孩子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学生们学好课本知识,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而对北外的同学们,张文梅说:“学无止境,尤其是语言。要利用好北外和北京这个平台,课本上的知识只是基础,学校教育与将来实践要用到的有很大的差距,应该多看书,利用好网络,开阔自己的眼界。”言及当年自己在大学的所见所学,除了学习,张文梅还特意提到了不要恃才自傲。现代社会人才比比皆是,要放下身段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对。大学比起前几个阶段的教育更多的是为学生提供了社会性教育,社交和生活也成了学生的必修科目之一,多与人打交道,与人交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有理想和目标,机会从来都不缺,把眼光放长远,平时努力工作学习,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既是寄语又像是张文梅对自己成功之路的总结,你比别人多一些机会的原因可能就是比别人努力了一些。人生中不乏机遇,能否抓住它都取决于你生活的态度,所以,用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报你更多。

(文/刘惠中 王乃卉)

# 中国灵魂 世界胸怀

## ——访万怡挺校友



### 人物简介：

万怡挺，北外1994级英语系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四川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北外校友会四川分会理事长。曾任眉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和商务部世贸司办公室主任等，并在中国驻欧盟使团经商处工作多年。中国获得WTO贸易政策高级证书第一人。

第一次对万怡挺进行语音采访的时候，笔者听到手机那一端自行车、汽车和行人的声音，那是四川民间的味道，是清冽的生活味道。带着对地方的爱，为这座城、这块土地、这些面孔而服务，为理想而忙碌并迎接接踵而至的机遇与挑战，充满了万怡挺的生活。

## 恰同学少年

万怡挺从小在南京长大，对他来说，受到南京的影响极大。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说：“南都风尚，最为醇厚”，南京人敦厚质朴，自古为人称道，因为心眼实诚憨厚又有“南京大萝卜”之称。受家乡的影响，万怡挺养成了一种乐观豁达的性格。除了念念不忘的家乡，湖南“阿爹”对他的性格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湖南人的“霸蛮”，也就是坚韧，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按他的话来说，“骨子里就有湖南人不服输的基因”。

在万怡挺的记忆里，70年代的孩子是幸运的，放学后可以和小伙伴们聚在大院里一起快乐地玩耍，弹玻璃球、拍洋画、逮蚰蚰，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稍长大一些的时候，万怡挺考入了当时江苏最好的中学之一——南京外国语学校。学校鼓励孩子们拓宽视野，多方面发展，并在90年代初就有了网球场，

也正是在这里万怡挺和网球结下了不解之缘。进入北外后，在学习之余，万怡挺和几位网球爱好者倡议举办了北外历史上首届网球比赛，并从该比赛创建起，蝉联三届男子单打冠军，被同学们称为“北外桑普拉斯”，也因此积攒了不少人气，在大三时获评为“北外十大杰出青年”。如今，原先坑坑洼洼的黄土地球场已被专业的塑胶场地取而代之，当时的北外网球赛推动北外网球队蓬勃发展，为学校争得了多项荣誉。

## 折冲樽俎，不战而屈人之兵

毕业后，万怡挺进入对外经贸部，主要负责欧盟国家的经贸投资事务。扎实的语言基础让他在对外工作上有一定先发的优势，能及时地接触到国外信息并可以和欧洲各国的外交官自如地交流，在做研究时也可以快速查阅国外前沿的文献，从而整合国际资源完成工作和研究。

在商务部期间，万怡挺成为中国获得WTO贸易政策高级证书的第一人，曾任中方参加知识产权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贸易与环境理事会代表团团长和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投资组组长等，带队参加相关重要谈判。在G20和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万怡挺也多次作为中国商务部部长的特别助

理，专门负责 WTO 谈判事务。

2003 年，万怡挺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中国驻欧盟使团经商处工作时，负责和 WTO 相关的事务。他对相关的海量资料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在阅读 WTO 贸易政策审议 (trade policy review) 材料时，万怡挺发现了 1995 年欧盟（当时还称为欧共体）扩大时与各国进行过补偿谈判。当时，中国刚于 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而在 2004 年，欧盟将要进行新一轮的东扩，即从原有的 15 个成员国扩大为 25 个。因此，万怡挺据此判断，中国在加入 WTO 以后，同样有权就欧盟 2004 年的扩大要求谈判。这次补偿谈判的重要性在于，一些国家在某些产品上的关税水平原本比欧盟要低，但在加入欧盟后，这些国家为执行相同的贸易政策，提高了相关产品的关税，这样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就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权益。同时，加入欧盟使得一些国家原有的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如对中国实行的反倾销措施范围变大等，也会对中国产品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为此，万怡挺提出了与欧盟谈判的建议和具体方案，经过国内多方部门的审核和论证，以及其他国家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和全球知名律所的咨询确认后，中方及时提出了谈判请求，最终，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方成功使欧盟为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补偿，维护了中国企业的权益，是中国成功运用 WTO 成员权利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谈判。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万怡挺说，“但这种妥协是双方的，如何在双方妥协的过程中取得主动最主要取决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在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中美就 WTO 领导人的声明存在巨大分歧，当时万怡挺还是处长，被授权与美方高级谈判代表，现美国驻 WTO 大使迈克尔·庞克（也是《荒野猎人》原书的作者）进行谈判。万怡挺根据谈判授权，准备了高中低多套预案，并确保每句话都有相应出处和依据。最后一次谈判中，双方围绕一段话中几个关键的表述争执不下，其核心甚至只关系到几个关键的具体词。在距离各国领导人对首脑声明表决只剩下三四个小时，万怡挺和庞克各自提出的方案仍有不小的差距，双方互不相让。这时，万怡挺拿出了与双方现有方案完全不同的第三种谈判文本，在表达思路做出了整体转换，这个文本考虑到了美方的关注，但更多程度地纳入了中国的关注，而且万怡挺对新方案的每一句表述都阐明了依据和出

处。新方案从形式上看是中方的又一次积极尝试，从而使中方占据了主动，美方由于在短时间内很难提出新方案，只能在中方新方案基础上做了一些形式上的修改，再加上美方也不希望谈判破裂，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对此万怡挺深有感触，一是目标要明确，清楚底线在哪里；二是，想要双赢又要把握主动权就需要比对手更加勤奋和努力，做好各种情况下的多套谈判预案，在关键时刻能提出多重选择，提出选择的能力越强，就越主动，对方想要拒绝就越被动，压力越大。

万怡挺的另一件“法宝”是牢牢抓住法律依据和相关授权等有力武器。在一次 WTO 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会议上，欧盟代表按会议要求提出关于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报告，但实际上该调查报告中关于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内容（如援助和培训等）少之又少，反而大量提及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指责，甚至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夸大的恶意攻击。万怡挺和他的团队在会前仔细阅读了这一报告，看清了欧盟希望炒作此事的真实目的。他仔细查阅了 WTO 关于知识产权理事会相关规定，发现关于此类报告的授权中明确列明要集中阐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果，而并不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评价。为了制止欧盟的炒作，在会上，万怡挺直接点明了该报告违反会议授权，从“根”上驳斥了该报告的合法性，随后正面阐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大进展和具体的案例。

## “为当地切实地做一些事”

万怡挺称，世界胸怀会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更具包容性，但同时，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拥有中国灵魂，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因此，万怡挺加入了第 14 批中组部组织的“博士服务团”，走进基层，任职四川省眉山市市长助理。在万怡挺任职期间，牵头在眉山市举办了整个西部地区第一次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韩自由贸易区第十一轮谈判），为眉山市发展国际会展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让更多的韩国企业了解了眉山，加快了它们在眉山市的投资。同时，由于国际媒体对该次谈判的广泛关注，眉山市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在眉山市任职期间，万怡挺负责了商务、投资促进、对外事务、

##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国资管理、发展改革、环保等工作。他说：“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是令人难忘的，人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高的格局和广阔的视野，立地就是要对具体国情有第一手的了解。在眉山市工作时，我有很多机会去很多县乡村看一看，了解地方各层级的工作机制和具体问题，受益非常大。眉山市的工作经历锻炼了我服务地方的能力，在那里的每一天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同时，我可以把自身的长处和地方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为地方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在眉山市的锻炼，让万怡挺有了实际操作投资和商务项目全流程的经验。他说：“只有我们有实际操作的经验，才能使具体的项目落地，制定具体的政策才更有可能产生实际效果。”

现在，万怡挺任四川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负责招商引资和对引进企业的培育和服务。包括京东方 AMOLED 新型显示面板 400 多亿等重大项目在内，万怡挺每天都会接触到许多新的项目和新的企业，两年内接触的知名企业共计两百多家。万怡挺称目前的工作对自己的提升非常明显，因为每天都能接触到中国经济的最前沿和最具体的单元，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脉搏和各种企业的商业模式、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同时能和团队一起努力，引进一些好的项目，为地方切实地做一些事。

### 中国灵魂 世界胸怀

万怡挺如今的工作成就和他扎实的语言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在北外读本科时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万怡挺在出国读研以及在中科院攻读博士的过程中，有着较强的搜集和处理英文文献的能力，为其充分学习吸收国际上的前沿成果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因为他较早获得了欧盟的中英同声传译证书并且法语也比较熟练，过了语言关，才有机会很早就谈判中被委以重任，有了更多掌握 WTO 规则的机会。在地方工作时，他精湛的语言水平、国际视野和对国际规则的把握也为工作增添不少色彩，在对外进行招商引资时，用外语进行宣传和交流不仅能省去翻译的环节，更能使对方产生亲切感，对当地的国际化水平产生信心和认同。

尽管语言能力非常重要，万怡挺还是想对学弟学妹们提出一些建议——在语言能力之外，还要尽量多掌握金融、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仅要国际化，还要多了解中国国情，清楚哪些政策

在地方能够落地和产生实际效果，哪些是中国基层最真实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用国际化思维去更好地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实事。

(文 / 吕昕玥)

# 专注俄语教研，开启人生格局

——访李志强校友



人物简介：

李志强，北外四川校友会会长，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国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 985 三期“南亚区域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平台当代俄罗斯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中俄文化交流等，主要为本科生及硕博生讲授《俄罗斯文学》、《俄语视听》、《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等课程。

“喂，你好！请问是董同学吗？”电话那头传来李志强校友温润的声音。几句问候，让人放松下来。

“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尽管问就好了。”校友爽朗地说道。由于校友在成都，这次采访只能以电话形式进行。

## 不忘初心，学习俄语几十载

“我的祖籍在山东泰安，小学时随父母到内蒙古支援建设，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由于我就读的中学俄语师资力量很强，加上自己对俄语很有兴趣，便开始学习俄语。没想到这一学就伴随了我一生。”能有一份事业与志趣相投，让人坚守一生的工作，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吧。随后的高中 and 大学时代，由于兴趣盎然加上自己学习勤奋，李志强的俄语成绩一直很好。“我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俄语系。大二开始，除了课上学习，我还用与俄国留学生交流、看俄语的原著小说、每天听俄语新闻 30 到 60 分钟的方式帮助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

本科毕业后，李志强选择了留校任教。“当俄语教师不仅可以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还可以把自己所学分享给学生，这带给我极大的成就感。”随后，为了系统地扩展自己的知识，李志强选择了继续在四川大学俄语系读研。之后又奔赴到黑龙江大学攻读俄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并于 2006 年到 2008 年期间，在北外做俄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

对李志强来说，在北外不仅提高了专业素养，也陶冶了情操。“我在北外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合作导师是张建华教授。张教授在理论方面底蕴深厚，实践能力也非常强。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很敬佩。在我求学期间，导师帮我改论文，都是字字斟酌，十分认真。”目前我和张教授仍然有着紧密的课题合作。这段师生关系因为俄语持续到了现在，张教授细致认真的学术精神也让李志强从中习得做学问的真谛。“我在北外的时候人事处的老师对我十分关照，从生活日常到教务问题，处处帮我考虑。”人事处的老师们也把自己的工作当成责任。

##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在北外期间，李志强看到了北外人的专注和严谨，也感受到了北外人的服务精神。

在北外短暂的求学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有了北外情结，每隔两三天我就会上北外的官网看看有什么最新动态，每次来北京出差我会尽可能住在北外宾馆，闲暇时可以到校园走走看看。北外图书馆变化很大，现在都成了北外的文化符号，前面的池塘也为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绿化也越来越让人赏心悦目了。”

### 勤恳教学，培养后辈开拓视野

从北外毕业后，李志强回到川大继续任教。在大学教育方面，他有着自己的见解。“大学应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李志强 2012 年在美国访学期间，了解到美国的大学在学生一、二年级时会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到了三、四年级才进行专业选择。这样虽然遵从了学生的志趣，但也有其劣势：

“大学前两年没有学习专业的基础知识，容易造成学生基础知识不牢固。但是美国的大学很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创新能力，这正是我们中国的大学所忽略的。大学除了教给学生们技能和知识，还要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如何选择和利用这些信息，并且从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就要看我们的自我学习能力。”

学习了几十年的俄语，也听过“语言就是一个工具，算不得是一个专业”这样的说法，对此李志强有着自己的理解：“具体来说，语言专业的教学方向分为研究型和技能型。研究型侧重语言对象国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历史方面；技能型更关注学生语言的运用能力。就技能型来说，高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学术研究讲求精益求精，技能型也需要注重技艺精湛。目前我国高端翻译人才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语言技能教育方面更上一层楼。”

在工作之余，李志强喜欢跑跑步，打打羽毛球。

“其实我不太会打羽毛球。2012 年到美国访学，我的导师经常约我去打。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自己打不好，扫了兴。后来在导师的鼓励下练习，我的技术才逐渐好起来，现在有时间我就会去打打球。现在想来，这就是一种‘不设限’吧，不把自身的不足看成是一种阻碍，反而去弥补它，大学生也是应该如此。大学期间，不能因为自己的实践经历和能力不足就躲在象牙塔里面。可以多多利用寒暑假

去实践，实习，旅行，去了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李志强也喜欢读书行路，看看文史哲类的书籍，到处旅游，增长见识。每次出去旅游时，他也会带上孩子，“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都好了起来，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现在有了这个条件，我想让孩子开拓视野。平时我也没有给孩子报课后培训班，就是希望他能够学会自己管理时间，自由发展。”李志强希望能培养起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 联结校友，助力四川开放发展

今年 4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校友会正式成立。李志强作为四川校友会的负责人之一，经历了整个筹建工作。“四川校友会的成立耗时较短，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划。”然而，我们在筹划时，也碰到了不少困难：首先，北外的四川校友分布各地，有的校友没有联系方式，有些老校友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在北外校友办的支持下，我和四川省投促局的万怡挺校友建了一个北外校友微信群，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分工协作，各自联系到了认识的四川校友，加上学校有记录的四川校友，总共联系上了 100 多人。校友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准备举办四川校友会成立仪式。但是我们选定的时间恰逢成都举办糖酒展会，当时酒店预订十分困难，还好外研社西南信息中心为四川校友会成立提供了会场。在各方的努力下，我们北外四川校友会终于在 2016 年 3 月 26 日下午，在成都国际家园酒店成立。当日，北外党委书记韩震、校长彭龙、党委副书记赵旻、副校长闫国华，北外校董、成都尚古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柯，来自四川各地的一百余名校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校友会得以成立，是大家的功劳，这也是大家的校友会。“谈到四川校友会未来的发展，李志强校友明快地说道，“我们打算以成都为中心，逐渐辐射到周边的绵阳，德阳，广元去，吸纳进更多的校友。在这方面，校友会秘书长、西南信息中心戴主任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要积极和北外校友总部联系，为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达到双向沟通的效果。2016 年 3 月 27 日上午，四川省与北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科教实力雄厚，当前正积极推进全面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这与北外学科优势、人才培养方向高度契合。作为校友，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四川在为北外输送优质生源的同时，也

能借助北外的人才培养优势，为自己发展开放型经济推波助澜。”

谈到最后，李志强不忘寄语北外的学子们：在学习之余，不要忽略了锻炼身体，他笑着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没有强健的体魄，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在学习上，应该牢牢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不要执着沉迷于书本，要积极接纳、包容不同文化，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北外这片沃土里成长为一个世界公民。站在人生充满无数选择的路口上，“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我们随时会面临的问题。所谓“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塑造着自己的品性和未来。“祝福北外的孩子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塑造者，希望你们能携手开拓新的辉煌篇章！”李志强的话，充满着正能量，让人奋进。

兢兢业业三十载，凝心做学问；真真切切数万句，诚恳献箴言。

七十余载，巍巍北外，世辈有才人出；勤勤恳恳，学成反哺，滋养代代学子。

采访校友的意义即在于能通过与长者对话找到一些人生的指引：努力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努力开拓视野；拥有一颗包容的心，求同存异，接纳不同文化，提升自己的格局。

（文 / 董益君）

## 从抗大俄文大队长到空军中将

——将毕生献给祖国航空事业的常乾坤同志

常磊常 仞

人物简介：



常乾坤，1904年生于山西。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赴苏联，先后入红军中级军事航空理论飞行学校和航空领航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苏联红军独立航空大队任中尉领航员、准校领航主任。1933年入红军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1938年9月回国，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1940年到延安参与筹建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任教务主任。1941年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大队（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大队长，1941至1945年任军事学院俄文科俄文队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航空组副组长。1945年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总队长，参与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先后任副校长、校长。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建空军，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3年后兼任空军军事学校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

常乾坤同志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于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他是我党最早培养的航空理论和航空技术专家，是人民航空事业的开拓者，是我党我军在1946年建立的第一所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之一，为人民空军建设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人民航空事业的先驱。他同时也是我党俄语教育事业的先驱，是俄语教育家和军事翻译家。

常乾坤1904年9月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下亳村。他在垣曲读完高小（民国时期4—6年级为高小，实际水平相当于目前的初中）后，为寻求出路，考

入了讲武堂（这是一所培养军人的学校，不收学费，还给一点军饷）。在大革命风潮的推动下，他于1924年奔赴广州，投奔革命。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在炮兵队学习。由于他学习勤奋，勇敢机敏，表现突出，几个月后即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周恩来同志推荐，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期间任区队长和党小组长。

1926年5月，常乾坤同志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深造，开始在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和领航。在此期间，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航空理论、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掌握了飞行、领航、射击等实际操作。毕业后，在苏联空军部队担任过飞行员、领航员、射击教官及飞行大队长、领航主

任等职务、军衔曾为上校。1930年1月，常乾坤同志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驾驶战机，翱翔蓝天。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工程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进一步钻研航空理论和航空工程学。常乾坤同志身在苏联，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嘱托，立志学好航空专业，等待报效祖国的机会。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毕业设计时，他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可大批量制造的水平，但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扬。他获得了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他人在异国，再也坐不下去继续读书了，找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任弼时同志，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7月，他终于得到任弼时同志的批准回国参战。他等不及拿到毕业证书和文凭，和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维护和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的王弼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回国。

从莫斯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通知他和王弼同志暂时留在迪化帮助在那里（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航空的八路军学员<sup>1</sup>。那时，常乾坤同志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的航空知识报效祖国。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同志等留苏人员任教。因此常乾坤和王弼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用其他方法帮助八路军飞行学员。在此期间，他们翻译了从苏联带回来的大量航空教材，包括飞行原理、射击学、领航学以及发动机的构造和原理等。他们还利用八路军学员在节假日回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机会，给八路军学员补课，解答他们学习上的问题，帮助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八路军学员尽早飞上蓝天。这样，他们在新疆逗留了两年。后来由于新疆形势恶化，常乾坤和王弼于1940年12月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和王弼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们并给予鼓励。1941年4月经中央军委决定，延安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即军委航空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学校。为了保密，学校

设在安塞县城西侯沟门村的一条山沟里。学校所在的几排窑洞，紧傍着一条名叫李（杏）子河的小河。1941年4月6日，学校正式开课。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任教育长。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延安无法得到苏联的航空器材援助，航校不得已于1943年初停办。此时军委已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办了俄文大队，于是调常乾坤去俄文大队培养高级俄文军事翻译人才，任命他为俄文大队大队长。

## 教授俄语的教育家

1941年8月到1945年8月，常乾坤同志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俄文大队任大队长，后又兼任军事学院俄文队和军委外文学校俄文教员和军事教员。抗大俄文大队、军事学院俄文队和军委俄文学校是培养高级军事翻译和外交人员的高等院校。今年（2011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建70周年，建校日就是常乾坤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抗大三分校创办俄文大队的日子。为搞好教学，常乾坤同志主编了《俄文文法》、《俄语会话读本》、《俄文常用词汇》、俄文《军事文选》（上下册）和军事条令等俄文教材和参考材料。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他用俄语讲授的“合同战术”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重的师长。他在山沟的窑洞里培养出了一批后来长期担任我国驻外大使和参赞的外交家，如驻苏联大使李则望、驻匈牙利、波兰大使马列、驻蒙古及黎巴嫩大使许文益，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安致远、何理良，及凌祖佑、白布佳、高世坤等参赞，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家如付克、苏英、张天恩、尹企卓、罗俊才、朱允一等，翻译家如何匡、罗焚、蓝曼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抗大俄文大队学员麦林等同志后来在空军党委领导下组建了一支七百多人的翻译队伍，他们在新中国空军建军初期，特别是空军受苏联援助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民空军之后的翻译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下面成立航空组，常乾坤同志任副组长，负责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初，航空组为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飞抵延安主持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保证了观察组飞机在延安的安全起降。

1.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创办了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我党考虑到人民军队的长远建设，利用这一机会，选送一批原红军同志到航空队学习技术，以培养一支航空技术队伍。自1937年8月起，中国红军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创办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建立根据地。常乾坤同志肩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率一部分人赴东北，去完成创建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历史使命。离开延安前，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对创建航校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一直是鼓舞常乾坤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勇往直前和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1945年10月，常乾坤同志带领俄文大队学员张开帙、刘玉堤、马杰三、王诚、欧阳翼、谢挺扬、麦林等一行二十余人，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出发，奔赴东北去开办大家盼望已久的航校。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了东北的抚顺城。抵达后，他们首先向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做了重要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到日伪、土匪、特务的严重破坏，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有的缺翅膀、少尾巴，有的没有胶皮轮子，有的座舱仪表盘被砸碎。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和遭到进一步破坏，东北局要求常乾坤同志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动脑筋，想办法，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毛主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鼓舞着大家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常乾坤同志和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一起，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器材。除锦州等地少数几个机场外，沈阳、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公主岭、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同志们的足迹都踏遍了，甚至连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也访问到了。大家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寻找汽油、滑油。各地党政机关、民主联军、土改工作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了常乾坤他们很大支持，不仅帮助他们摸情况，提线索，当向导，看管器材，还支援运输工具。当时最困难的

是交通不便、火车不通，收集起来的破残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出去。老乡们就用牛马大车把收集起来的的东西转运到目的地。搜集器材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紧张的，不少同志累出了病，有的同志在抢运器材时压断了手脚，成了残疾；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的毒菌场，中了毒，得了慢性疾病；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收获是巨大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志们先后从各地收集了不少飞机、发动机、油料、仪表以及其他航空器材。虽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的飞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只能拆下点零件来拼凑使用，但这却是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保证航校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工程人员的主要物质基础。后来，同志们回顾历史，风趣地说，东北老航校就是靠捡航空破烂和修航空破烂起家的。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正式成立，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为了保密，学校代号为“三一部队”。

### 严冬中建航校

东北航校刚刚建校一个多月，国民党就破坏了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向东北解放区进攻。在辽宁的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不得不迁向北方。1946年4月中旬，由南满<sup>2</sup>的通化迁到北满的黑龙江牡丹江市。1946年6月1日，学校在牡丹江市开始飞行训练。4个月后，国民党军队在我“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政策下逼近了哈尔滨，我党政机关均撤离了哈尔滨，航校也由牡丹江转移到小兴安岭西南濒临中苏边界的东安市。

从牡丹江到东安的这次“搬家”，时值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物都是残垣断壁，几乎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尤其是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气温降到零下30℃到零下40℃，手触到金属物质能被粘掉一层皮。在当地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修缮、抢运，航校于11月底安全迁到了东安。

两次“搬家”的组织工作都十分不易。能飞的几架飞机不能从地面走，要从空中转场，但是当时

2. “南满”、“北满”的划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1907年7月，日俄签订协定，在其中的密约中，日俄划定了南满和北满的分界线，正式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以松辽分水岭作为地理界限。此线以北的“满洲”地域为北满，以南的“满洲”地域为南满。

没有中国人能驾驶，如果叫刚收编的日本飞行员飞，大家又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常乾坤校长毅然决定让日本飞行员驾驶飞机，结果日本飞行员安全地完成了空中转场的任务，这件事也说明常乾坤校长具有当机立断的胆识。地面上的搬迁组织工作也很复杂，给航校增加了许多困难，打乱了航校的工作计划，影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但通过搬家也锻炼了干部，培养了同志们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转场的工作能力。

航校的核心力量是中央派来的四批学过航空的干部以及东北局派来的政工和后勤干部，这四批干部和政工、后勤干部也是从各个单位来的。此外航校还有汪精卫空军起义人员、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伪满空军人员以及一支收编来的完整的日本航空部队。这些人员思想、作风各异。他们有的在苏联，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法国学过航空或从事过航空工作，没受过统一的培训。日本航空部队更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开始时大家连技术名词都是各说各的，彼此争执不下。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集体，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方针、政策，是团结不起来的。

## 团结楷模

为了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培养未来空军航空技术骨干”的光荣任务，常乾坤校长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教职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本着党的“革命不分先后”的政策和原则，对不管从哪里来航校的人都视为革命同志，一视同仁，大胆使用，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办航校就是要为我军培养飞行员和保证飞行的机务人员，但是，当时我们自己没有教飞行的和教航空机务的教员。延安来的党员同志中，有学过飞行的和学过机械的，但是，他们原来学的不是日本飞机，而且技术生疏了。而老航校是要用缴获来的日本飞机进行飞行训练，因此，首先要成立一个教员培训班，使这些过去学过飞行的同志恢复飞行技术，以培养教员。这个飞行教员培训班就本着“革命不分先后”的政策，吸纳了三位汪伪起义人员。

东北老航校的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主要来自向我军投诚的日本部队。这支日本部队是日本关东军设置在沈阳附近奉集堡的培训飞行员的联队，有

三百多人，队长是林弥一郎少佐。日本战败投降后，他拟带领部队经朝鲜回国，走到吉林凤凰城附近，经我军说服而投诚，被我军收编。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领导林彪、彭真、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训练航空人员。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有碗饭吃，林弥一郎与属下商量后，提出了帮助训练我空军技术人员的三个条件：不以俘虏对待，保证有研究、工作和严格要求学生的权利；保证他们体力、精力，能充分休息，尊重他们吃大米、洗浴等饮食及其他生活习惯；允许带家属，允许青年军官结婚等。东北局领导接受了这些条件。

他们到航校后，刚开始学生仇视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学飞行，不给日本教官敬礼。对抗情绪也使有的日本技术人员消极怠工，背地里不好好工作；在看到中国政府遣返大量日本侨民回国时，他们也闹着要求回国。以常乾坤为首的校领导及学校的共产党员对他们一视同仁，生活上优待，工作中放手使用，还开导学生尊敬这些教员。渐渐地，他们开始认真履行教学职责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航校里上下级平等、军民关系融洽，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工作起来不讲报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受到了感动，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逐渐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开始和我们一条心了。他们自觉地、积极地为我们训练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在工作中，有三十多人牺牲在岗位上：一位油料员为救中国同事，自己被火烧死；一位汽车司机，在国民党飞机来机场袭击时，为保护航校的飞机，开车在跑道上猛跑，以吸引敌机，结果汽车被敌机打中……我军从长春紧急撤退时，来不及通知在机场的十多位日籍技工，他们不投国民党，宁可翻山越岭走回牡丹江。这支部队后来按协议返回日本，因受歧视而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较好的工作，普遍生活困难，但他们并不后悔，认为他们在航校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组织了“航七会”、“日中和平友好会”等协会开展中日友好工作，其中许多人还捐助过中国的希望工程。

常乾坤对航校里的起义人员也同样不计前嫌，团结共事，放手使用，使他们能够积极愉快地投入学习和工作。有的起义人员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献出了生命。

### 创航空史奇迹

办航校，要有飞机，当时林保毅（林弥一郎的中文名字）部队能飞的大小飞机有16架，在沈阳周围机场收集到的破烂飞机有30多架：这就是老航校建校时的全部家当。从沈阳迁通化和从通化迁牡丹江时，利用搬迁的机会，常校长派人把沿途几个重点机场的破烂飞机抢拆、抢运回学校，这样又收集了60多架破烂飞机。他同时把全校人员遍撒东北各地，对飞机和航空器材做拉网式的收集，但结果却不甚理想。辽沈战役结束，进入平津后，航校又搜集了一些美式飞机。这样到老航校结束教学任务、退出历史舞台时，总共有飞机120多架。航校搜集到的零件、部件很多，特别是在平顶堡秘密仓库拉出了数百马车的零部件箱，还搜集到了部分修理厂的设备。

### 直上“九九高练”

有了教员和飞机，就可以开始飞行训练了。飞行训练，一般从飞慢速的初级教练机开始，然后飞中速的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速的高级教练机。循序渐进，保证安全，是航空教学的规律。当时老航校只有初、高级两种教练机。初级教练机只有五架，而且是木质骨架，机身和机翼是蒙布的，饱经风吹雨打所以也不好用了。6月6日，飞行科长驾驶一架初级教练机带着教员训练班的一位学生进行飞行技术恢复训练，因机械事故而导致机毁人亡。另四架初级教练机也不敢再使用，最后全部报废。初级教练机没有了，怎么办？按老规矩走，航校就没办法办了。有的人提出直接用高级教练机教学，“一步登天”。反对的人却说：“飞得高，摔得响！”关键时刻，常乾坤校长对大家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直上“九九高练”（九九式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九九高练”）！这条路是有危险，但难不倒共产党人。他和校主任教官林保毅研究出“三级带飞”教学法，解决了直上高级教练机教学的问题：一级是一个教官教四个学员，包括讲理论、空中带飞、指导动作、地面观看起落动作。当认为学员可以放单飞或可以进行新的科目时，由负责的教官报告二级主任教官。二级主任教官共四人，每个主任教官下辖四个教官。当主任教官接到飞行教官的报告后，要了解这个飞行学员的全部飞行情况，并亲自带飞，

实际了解该学员的飞行情况。二级主任教官如果同意该学员放单飞，再报告校主任教官林保毅。校主任教官在空中考察后才决定能否让该学员单独飞行。这一教学方法真是行之有效，用这种由破烂飞机拼凑起来的“九九高练”教授学员，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这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世界航空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 酒精当汽油

飞行训练取得了进展，另一个难题又摆在了面前：上天不久，飞机就没有油了（汽油供应紧张），飞机没有油，飞行训练就要停止，学校又要办不下去了。常乾坤想，能否用酒精代替汽油？据说日本人曾研究过如何用酒精代替汽油。这一想法提出后，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学校现有的汽化器的喷嘴口径较大，不适合酒精使用。校领导组织专门小组研究此事。至于用酒精代替汽油是否现实，还需要在试飞中实验。来自起义队伍的副校长白起和日籍主任教官黑田自告奋勇冒险驾机试飞。试飞成功地证明发动机喷嘴稍加改进后是可以利用酒精飞行的。学校立刻将此情况报告了东总。我军因此接收了哈尔滨的一个大的现代化酒精厂和几个大酒精工厂，陈云同志保证为酒精生产供应粮食，要多少给多少。这样就解决了飞行急需的汽油的问题。这是老航校的又一个创造。

### 实物教学

接受机械教育时，按一般的教学规律，学员应先学理论，再学操作。老航校的第一批学员政治性强（有的经过战斗的考验），但因文化程度低，理论听不懂也学不进去。校领导决定先补习他们的文化。文化课学习时间太长，学员们不愿学，有的还提出与其这样不如去前方打仗。这时一位讲发动机汽化器的教官，用烟卷吸出的烟往油路里面吹，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使学员通过油路了解了汽化器的构造。常乾坤同志发现后表扬了这种教学法，并在学校进行推广。学校利用已有的飞机、发动机和仓库里的零部件，迅速组成了六个实习教室，进行“实物教学”。教官拿实物讲，学生也拿着实物看，很容易就懂了。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就把“九九高练”整个飞机都学通了。1947年开飞时，学员们到外场和修理厂实习，竟能自己维护飞机和修理飞机。冬季停

飞，他们带着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回到课堂，对学习有关理论感兴趣了，一个个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并通过学习，达到了工程师的水平。1949年空军成立后，他们被吸收入空军的航校、部队；后来在抗美援朝、进藏支援及其他各种任务中，都表现出色。“实物教学”也成了老航校的一种创造。

## 艰苦办学

航校成立后，国民党加紧压制我们，不断派飞机前来捣乱。他们早把航校当成了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棵新生的嫩芽。敌人的空军曾集中了15架轰炸机，轰炸扫射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我军6架飞机，伤我6人。在牡丹江，特务又纵火烧毁了航校的一个汽油库。以后，航校一步步向纵深转移，敌机也一步一步跟上来。凡是有航校飞机飞行的机场，都遭到了敌机的袭击。前后被敌机打坏的有10多架飞机。当时航校既没有高射武器，又没有能打仗的飞机，只能躲避，无法还手。那些架着先进的美式飞机的国民党飞行员像疯狗一样，常是早上八九点钟就飞临我机场上空，盲目扫射、投弹，有时轮番在空中巡逻，直到午后三四点钟才飞返老窝。

在敌机频繁骚扰的情况下，校领导与有关同志研究决定，采取打游击的办法，即利用早八点钟以前、下午三点钟以后这段敌机来袭的空隙时间进行训练。白天把一些能飞的飞机移到临近的山沟里隐蔽起来，傍晚再拉回机场。为了对付暗藏的匪特，飞行员都随身带着手枪和手榴弹以保护飞机。

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学校师生不仅吃不到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经常吃的是玉米碴子和窝窝头。常校长带领全校人员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春夏季挖野菜、拾鸭蛋，秋季打猎，冬季到草塘里敲开厚冰抓泥鳅来改善生活。住的房子是因陋就简、紧急赶修起来的：房顶是洋铁瓦，窗户不严密，雪花会飞进屋里来；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得窗户哗哗响，取暖设备差，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踏步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安全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袄和单步鞋，用麻绳将自己捆到座椅上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也是补了又补的。就是在这样食不果腹、衣不暖体、屋不御寒的情况下，师生们起五更睡半夜，在雪深没膝、北风刺骨的寒冬腊月，忍受着严寒与劳累，顽强地苦练着、工作

着、战斗着。以常乾坤同志为首的校领导在近四年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领导着东北老航校的师生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的干部和学员都是革命战士，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事业是无限忠诚的。

三年多的时间，这所航空学校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32人，领航班24人，场地等保障人员78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航空工业事业的骨干力量。

## 致力新中国的空军建设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了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机构。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当时兼任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同志提议，常乾坤和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直接汇报。

当两人汇报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经过的艰苦历程时，毛主席听得很入神。当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五百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说：我们的学生（常乾坤同志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为筹建空军，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由常乾坤任局长。

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于1949年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航空局也设在了北平。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于21日晨胜利强渡长江。军委指示航空局，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沪杭宁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4月22日常乾坤同志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抽调接收人员组成航空接受组的情况。之后，遵照周副主席“争取接管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的指示，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到南京、

##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上海、杭州、桂林和昆明等地进行接收工作，在各军区、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接收工作。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为保证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安全，常乾坤同志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迅速组成了一个担负防空任务的飞行队，并召集军委航空局的同志一起讨论起草了一个以美制P-51战斗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党中央和军委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了！飞行队下设四个飞行分队，一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此后，又成立了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常乾坤同志和方槐、油江等同志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建国大典准备会议。在会上，常乾坤同志接受了航空局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任务。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航空局拟好了机群通过天安门检阅的计划草案。这一计划草案在汇报中得到了聂代总长的首肯，聂代总长指示一定要保证安全。回去后，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及时安排了受阅飞行的计划，并重点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编队协同等问题。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多天，真是时间紧、任务重。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也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局长和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后来回忆，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无比紧张，直到受阅任务圆满完成，自己的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他又率受阅全体飞行员参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从开国大典到1961年的历届国庆阅兵，常乾坤都是空军飞行阅兵的总指挥。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

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同志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心情非常激动，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好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同志在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等各个方面，都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中朝联合空军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我国空军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我空军要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所以需要建立统一的指挥。空军党委决定由常乾坤同志着手筹组指挥所。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六十余人，由北京赴朝。之后，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刘震为司令员，王琏（朝方）和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的工作。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机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常乾坤同志亲自带领我空军场站技术骨干，即原抗大俄文大队的学生王诚等战士，发扬大无畏的精神，不顾美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到朝鲜各地巡察适合修建机场的地点。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修好了六个喷气机机场和十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返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志愿军空军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老航校训练的第一批飞行员刘玉堤等人在抗美援朝中大显身手，屡建战功，共击落击伤四十余架美国飞机，大大挫败了美帝空军的士气。

在朝鲜期间，常乾坤同志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干炒面，生活十分艰苦。他的工作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授予他“自由独立”勋章。

### 创建空军工程学院

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从我国逐步撤走，新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创建新航校。

1960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地址定于陕西省西安市，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问题，还

要准备调集教学人才。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就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取经。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的情况。常乾坤克服困难，最终使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得以顺利建成。

1964年12月，常乾坤同志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的职责由修理飞机转为制造飞机，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飞机。1966年5月，常乾坤同志先后组织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歼—8等型飞机的研讨和试制工作，获得成功。

常乾坤同志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人民空军和祖国的航空事业。他是在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成长的第一代航空专家，是人民航空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

常乾坤同志品德高尚，是一位不图虚名的实干家。他精通业务，尊重科学，一切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工作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励精图治，不尚空谈；他作风民主，善于发挥群众的智慧，共同攻坚克难；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关心爱护同志，视同志如手足；他作风正派，为人公道，心地坦白，待人诚恳，和蔼可亲。他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和为我国航空事业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本文摘自《延河畔的外文学子们》，2013年出版）

## 一对外国夫妇 一个中国村庄

——戴维·柯鲁克夫妇的记者生活

段津 高建

### (一)

一个风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我们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家里。房间里堆放着许多书报杂志，两架手提打字机敞开着放在桌上。盥洗室的门上贴着“随手关灯”的纸条。

三十多年了，这对夫妇孜孜兀兀，诲人不倦，为培养我国外语人才而辛勤地劳动。他们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活跃在外交、新闻、财贸和教育等各条战线上。凡接触过他们的人，对他们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无不交口赞扬。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却是鲜为人知的。原来他们不但是卓越的教师，而且还是刻苦认真的记者和作家呢。多年来，他们不但写短文而且还创作了三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篇著作：《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十里店》和《阳邑人名公社》。

### (二)

“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正酣的时候，我们乘着驳船沿大运河而下，通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一亿四千多万人民正在进行反对蒋介石斗争最后阶段的世界。”《十里店》开卷第一章描述的是1947年的情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党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亿万农民多世纪来梦想的“耕者有其田”就要实现了。三十多岁的柯鲁克和他的妻子伊莎白，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风尘仆仆地来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十里店（今河北武

安县境内）。他们想来了解和报道中国的土地改革经验，供世界其他具有共同任务的国家人民参考。

“中国人常说解剖麻雀。这正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村庄——十里店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在边区政府帮助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农民共同生活，促膝谈心，一起开会，亲临一幕幕斗争和生活的场景。柯鲁克对我们回顾了当时的生活：“我们住在一户中农家。起先我们的生活待遇很特殊，上面给我们派了专门厨师，后来我们回绝了。我们端着饭碗和农民一起蹲在地上吃饭。久而久之，老乡们几乎忘了村子里有两个外国人了。”

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生活了8个月，写了许多报道，同时为《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和《十里店》两书准备了大量素材。《革命》一书描述的是十里店从1937年至1947年10年中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村子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基本上铲除了剥削，但是还存在土地和胜利果实分配不均，民主不充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待整顿的问题。《十里店》实为前书续集，作者以亲生经历和见闻，描述了1948年初该村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情况。在上级所派工作组领导下，发动群众，审议了阶级成分，成立了扶贫机构，对土地和胜利果实进行了填平补齐，对斗争对象落实政策，整顿干部和党员队伍，为迎接全国解放作了准备。

为搜集两书素材，作者进行了半年多实地考察，而从素材到成书、出版，则经历了更长得多的过程。这里有一段曲折。

### (三)

当时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正当柯鲁克和伊莎白埋头写作《革命》时，党组织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到定县外语训练班担任英语教师。这一下柯鲁克和伊莎白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他们来华时原只打算逗留一年半，柯鲁克想的是当好一名记者，伊莎白则有一附带任务——完成她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如果应聘当教师，则他们整个计划就要告吹。“个人兴趣和革命需要发生了矛盾，真难办哪。”柯鲁克回忆道：“但我想起来华前英共一切负责同志给我们的临别赠言：‘到了中国一切听从中国党的调遣。’我们就照他的嘱咐办了。”对于柯鲁克和伊莎白来说，革命需要是第一位，其余都是从属的。

柯鲁克生于英国，在美国上大学时开始从事进步活动。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已日暮途穷，开始憧憬社会主义，1935年返英，次年加入了共产党，接着便参加了国际纵队去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在西班牙时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吸引。1938年他来华考察，在成都结识了在中国出生的伊莎白。伊莎白是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刚刚取得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正在中国西南实习。她十分同情处境悲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她和柯鲁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已变，双双回国投笔从戎，一个参加了英军，一个参加了加拿大军队。战后，柯鲁克在伦敦大学学中文，伊莎白继续攻读社会学。他们学习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因此不久他们主动申请，再次来到革命烽火燃遍的中国。他们渴望通过写新闻报道为革命服务，但当革命需要他当教师时，他们又毅然响应了。

### (四)

寒来暑去，年复一年，他们用尽心血浇灌着我国的教育园地，但是著书写文章的愿望始终在他们心里燃烧着。“我们觉得很内疚”，伊莎白说：“我们在十里店住了那么久，当地干部群众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拿出来。”于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是干扰很多。例如“在外训班时，常常在我们凝思或推敲时，有人进来问：

‘请问这个字属什么词类啊？’有时我们感到泄气，想干脆扔下笔杆不干了，但继而又想这样太负于十里店人民了。”“我们心情常常很矛盾，写作时觉得影响了教学，教学时又觉得耽误了写作。”坚持就是胜利。他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首先写出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1957年又完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十里店》。此后他们又利用假日重返十里店及邻近地区考察。利用暑假时间写出了《阳邑人民公社》。

《革命》一书自1959年在英国出版以来，已印行三次，《公社》也于1966年出版。《十里店》则于1979年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这三本书的发行量不算大，但在英、美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将《革命》和《十里店》定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对广大进步人士来说，这几本书更是难得的精神食粮。美国一读者在看了《十里店》后给作者写信：“我们这里每天听到一些评论家对中国的冷嘲热讽，在这种时候能读到中国人民伟大的现代史篇章和中国党的工作是特别宝贵的。你们的书犹如雪里送炭！”

### (五)

“你们的写作经验是什么呢？”我们问柯鲁克夫妇。柯鲁克说：“写作是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推敲琢磨，一写再写，是没有止境的。文字要力求精炼。在写《十里店》初稿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用了许多有政治色彩的词句，但写第2稿时都删去了。”伊莎白说：“要让事实说话，与其把作者对某些事实的感受和看法告诉读者，不如把促使读者产生这些感受的事实告诉读者，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去作结论。有时候作者费了许多笔墨想要加强某一论点，殊不知这样做时恰恰削弱了论点。”伊莎白还提到：过去很长时间中，新华社英文电讯稿在转载人民日报文章时常常略去令人信服的事例而留下干巴巴的结论。这种有骨无肉的文章在国外是没有人要看的。

“你们两位在写作过程中合作得顺利吗？”我们又问。柯鲁克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爱玩弄字句，有时因词害义。我还喜欢多写无关紧要的花絮，伊莎白就要问：这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或问：你究竟想说明个什么问题？”伊莎白补充说：“柯鲁克思想连贯性强，善于一气呵成，而我有时则过于注

##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重细节。我们互有长短，相辅相成。”

### (六)

1950年冬天。北京外国语学院三百多名刚入学的新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英语系副主任柯鲁克讲话：“我们教的是英语，我们学的是中国革命！”荏苒30年过去了，豪迈的言词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今天他和伊莎白仍坚守在教学岗位上，既教英语，又教世界史。既写文章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也撰文帮助中国人民正确地了解外国。他们热情地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到问题就写信或口头提出批评建议。他们通过书信，向外国友人介绍我们中国的建设，解答友人的疑问。他们的心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柯鲁克常常提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给他们的帮助。“当年我们亲自经历了伟大的土改运动，亲眼看到中国党的一系列英明政策的施行。解放区实行的高度民主，曾使我们惊讶得瞠目结舌。从那时起，我们就认定，跟这样的党走是绝不会错的。”近十多年的曲折道路，柯鲁克夫妇是和中国人民一起走过来的。林彪、“四人帮”曾使柯鲁克身陷囹圄，伊莎白也被“专政”，但这些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对中国党的信念。他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柯鲁克在周总理80诞辰时所写《忆周总理》一文结尾是这样说的：“周总理将永远鼓舞我努力奋斗。我要做好工作，改进工作和生活作风，搞好学习，使自己接近这位模范共产主义者树立的标准。”在谈话中，柯鲁克夫妇常说：“我们感谢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给我们的教育和帮助。”

感谢你们！柯鲁克和伊莎白同志！中国人民将永远不忘你们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祝你们在教学和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摘自《新闻战线》，1980（10））

# 我与美国海军大员打交道的故事

## ——联合国对伊制裁与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互动

万经章

作者简介：

万经章，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 1960 级校友，后转入英语系学习，1965 年毕业后进入北外英语系翻译班进修。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和外交部工作，历任国际司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联合国秘书处高级政务官。2004 年退休回国，先后任外交笔会副秘书长、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四天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著名的安理会第 661(1990) 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实行史无前例的经济封锁和全面制裁。同年 8 月 25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665 (1990) 号决议，授权在该地区部署有海军力量的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检查和制止进出伊拉克的所有船只，以保证对伊制裁得以执行。美国海军主导多国海上拦截部队 (MIF)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十余年间，先后共有二十一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的西方盟友，象征性的派遣海军舰只参加过这支海上拦截部队，但海上拦截部队的真正主角其实是美国自己的第六舰队。需要指出的是，多国海上拦截部队并非由联合国直接组建，它只是泛泛援引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665(1990) 号决议而已。它不受联合国控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甚至拒绝向联合国报告其活动情况，与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完全风马牛不相干。

当年，我在联合国秘书处总部主管对伊制裁工作，亲身经历了许多有意思的事件。与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拦截部队打交道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突破禁运，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绞尽脑汁，从陆路和海上开辟了多条走私通道，特别是通过红海经由约旦南部阿喀巴港走私所需物资，同时用小型船只通过波斯湾出口石油换取急需的外汇。

1996 年后，虽然联合国对伊拉克石油出口有条件地部分解禁，但所有进出口和相关活动都必须在第 986(1995) 号决议所限定的“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严格监控下进行，伊拉克的困难处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浩瀚的海洋和波斯湾多变的气候给伊拉克人走私提供了方便，也给美英等国监察禁运的努力增添了不少困难。

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几十艘战舰在红海和波斯湾常年游弋，检查所有可疑过往船只，对可疑的走私活动进行尾追堵截。它在遏制伊拉克非法活动的同时，也屡屡拦截一般商船，干扰了该地区的正常航行，妨碍了该地区沿岸国家的正常贸易，因而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当这些问题闹上安理会以后，如何处置这个两难局面便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伊拉克制裁委员会（简称 661 委员会）的重要议题。

安理会多数成员国认为，既然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授权来自联合国决议，该部队就有义务向联合国汇报其活动情况，必要时接受联合国的质询和指导。在 661 委员会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代表团从 1996 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向委员会提供有关信息。这是美国人被迫而为之的事情，内心不情愿，所以提供消息也不及时，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为了加强沟通，进一步落实对伊制裁措施，委

##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员会多次要求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协调员即时任美国第六舰队的司令官，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向伊拉克制裁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作为伊拉克制裁委员会的主管官员，我几次与美国代表就此进行磋商，美国代表开始找出了各种理由予以推诿，多次交涉均无果而终。然而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人找到我，出于意料地通知我说，他们的海军大员愿意来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委员会汇报情况了。

美国态度的这一突变令人高兴，但也令人意外。众所周知，美国历来反对联合国插手它认为依靠自己力量就可以操控的事务。当联合国 661 委员会要求多国拦截部队汇报情况时，美国认为此举是联合国多管闲事，最初根本不予理睬。现在态度突变，为什么？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自己意识到已力不从心，在控制海上走私活动方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奏效。美国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并不能号令全球，在红海和波斯湾地区频繁的拦截活动对海上正常航行构成干扰和威胁，面对地区内外许多国家的抱怨和抗议，美国意识到多国海上拦截部队只有得到联合国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师出有名”，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权衡利弊后，美国得出结论，让联合国有限度地介入对美国会利大于弊。

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作为伊拉克制裁委员会的主管官员，受命代表委员会主席与美国代表团就美军协调员来 661 委员会汇报工作一事进行沟通，双方本着务实精神，就会议议程和具体接待方案进行了几轮磋商。由于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美国军人到联合国总部汇报工作并接受质询，全球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对此事都十分重视，在协议尚未达成之前已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

这次是美国人因为有求于委员会而采取的主动，所以我与美团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几轮会晤之后很快就具体安排达成了协议，并取得了委员会的认可。

美国外交官办事非常认真，参与磋商的美军方代表也是有备而来，谈问题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对汇报材料准备得十分详尽仔细。661 委员会正式开会当天，美国海军的几名参谋和联络官由美国代表团的外交官陪同再一次提前来到我位于秘书处大厦 35 层的办公室，就会议程序和相关安排与我一一进

行路演和最后核实。

上午九时许，661 委员会会议在联合国总部第七会议室正式开始。全身戎装的美军第六舰队司令雷德海军中将率领七八名助手鱼贯而入，在联合国第七会议室面对主席的一端依次就座。平时一贯是西装革履的会议室内，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戎装的军人，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会议室入口两侧，挤满了各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长枪短炮两大排，咔嚓咔嚓拍不停。与会人士坐定之后，又允许媒体对这次特殊的会议进行了简短的拍照，之后，记者和非委员会人士被请出会议室，会议室大门一关，会议正式开始。而那些无缘见证会议进程的外交官和媒体记者，只能静静地候在会议室门外，一边交头接耳互通消息，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结果。

委员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后，宾主首先寒暄致意，然后，雷德中将便在委员会主席的邀请之下起立发言，由副官操作投影仪，用大量图片和数字详细介绍了多国海上拦截部队在该地区的活动情况，重点列举了不少美国自认为是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案例，请求委员会大力支持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工作。

作为秘书处主管官员，我坐在主席的左侧，时刻准备应对主席或其他成员可能提出的任何程序性或实质性问题。面对侃侃而谈的美国海军中将，心头涌起不少感慨。是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应该为自己侵略科威特的行径受到惩罚，美国人在联合国的大旗下“替天行道”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无辜的伊拉克人民却成了联合国制裁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才是真实地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弱者，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去拯救他们呢？此外，超级大国的炮舰外交后面，是不是还隐藏着见不得人的其他目的？

雷德中将介绍情况完毕，委员会主席和各国代表当然要遵循外交惯例客套地感谢一番。由于海上拦截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各国代表的发言、评论和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也确实让在场的美国人捏了一把汗。美国代表会后向我坦承，美方代表团的确曾担心这些海军大员在外交官面前会出现应对失当的局面，美国军人虽是有备而来，但他们毕竟不同于长袖善舞的外交官，为避免意外，美方代表团事先专门对雷德的随行参谋们进行了外交指导和培训。令美方代表庆幸的是，来参

加会议的这批美国军人训练有素，除雷德中将本人应对自如之外，其麾下的军官也个个有条不紊，分别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质询。三个小时后，由美国将军向联合国外交官所作的首场通报秀圆满结束，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上拦截部队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在此后的数年里，应 661 委员会的要求，先后又有法格、鲍迪、摩尔和科廷等四位美国海军中将或上将以多国海上拦截部队协调员的身份向 661 委员会通报情况，寻求委员会的进一步合作和支持。

根据美国人自己提供的统计数字，在这支部队活跃的十年里，它的军舰不间断地在红海和波斯湾的海上游弋，对过往商船和可疑船只进行了 30,000 多次盘查，其中登船检查 10,000 余次，约 1,000 余艘商船因所运载货物可疑或手续不全被勒令返航，或被押送至附近其他国家的港口接受处理。

应该说，多国海上拦截部队对遏制伊拉克的走私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费心编制的拦截大网也不是没有漏洞。再精明的猫也不可能把狡猾的老鼠赶尽杀绝，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石油走私船在风云诡秘的波斯湾与海上拦截部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它们利用熟悉海上环境的优势，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利用船体小不易被发现的特点，频频出没在公海与沿岸国领海之间。当附近海域没有美舰活动时，这些小船便大摇大摆地行驶在公海上，一旦发现美舰，便会迅速躲进沿岸国漫长的领海里，让只能在公海上执行任务的美国舰队眼巴巴地望海兴叹，鞭长莫及。美国和英国曾多次指责波斯湾和红海一些沿岸国家为走私船只提供方便，但当事国往往要么装聋作哑，对美方指责不予置理，要么回答说美方情报有误，其指责并不属实。偶尔，这些国家也会做做样子，扣押一两艘走私船进行一番调查，但海上走私活动仍在继续。这种情况让美国十分恼火，在它自己深感力不从心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转向制裁委员会求助，而委员会的及时干预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多国海上拦截部队与沿岸有关国家的紧张关系，使得对伊禁运更为有效。这也再次证明，美国有求于联合国才是它同意让其海军大员向联合国伊拉克制裁委员会通报情况的根本原因。

## 欧元与我的欧元情结

陈起元

作者简介：

陈起元，1941年12月生，江苏扬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1959级校友。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西欧司参赞、驻法国大使馆参赞、驻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领事。

欧元是欧盟地区统一的法定货币。1999年初，欧元正式启动，开始在欧元区成员国范围内发行。2002年1月1日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区成员国原有货币停止流通，同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货币。迄今为止，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已有18个（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芬兰、荷兰、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加入欧元区。

地处欧元区的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也使用欧元并被授权铸造有本国图案及国名的少量欧元硬币，主要用于人们收藏及馈赠礼品。本人退休后去圣马力诺旅游时就曾购买过一套梵蒂冈欧元硬币。此外，瑞士、列支敦士登、马德拉等国家和地区也发行了以欧元为面值的流通币或纪念币。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1998年成立，现任行长为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和欧元区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拥有独立制造货币政策的权力。欧元区成员国各中央银行参与欧元纸币和硬币的印刷，铸造和发行。

1979年3月，在法国和德国的倡导之下，欧洲货币体系宣告建立，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



应运而生。1993年，法国发行一枚埃居纪念币。正面是 ECU——欧洲货币单位字样以及发行年份 1993，背面是象征欧洲大一统——欧罗巴女神的头像。埃居是 1979 年欧洲货币体系创建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用于内部计价结算的货币单位，由当时的 9 个成员国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构成。1995 年，欧盟决定以欧元（EUR）为欧盟的法定货币，自 2002 年 1 月开始流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埃居是欧元的雏形，只是功能不一样罢了。欧元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联盟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欧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99 年 1 月 4 日起，欧元区股市全面以欧元报价，所有股票以欧元标价交易。银行及超市，大商

场等以欧元和本国货币同时标价。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三年的过渡期当中，百姓可以熟悉欧元的使用。1996年10月，法国勒克莱克特大超市发行过一枚欧元试用币，面值为1.5欧元可以在该超市使用。硬币正面是欧洲地图，明日欧元字样，背面1.5欧元、一圈是明日欧元以及1996年10月14日至26日勒克莱克超市字样。

本人在法国工作期间，有幸赶上欧元开始流通，从而为收藏欧元钱币和邮票提供了不少方便。2002年是欧元正式流通的第一年，法国专门发行了一枚纪念币，面值1/4欧元。2002年元旦，法国东部小城马尔科赛姆邮局刻制一枚邮戳，用于盖销当日在此发出的邮件，以纪念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本人为此特意从赛特拉斯堡（当时在该地工作）开车赶赴该邮局（离斯市不远）交寄了贴上欧元纪念邮票的信函（见实寄封照片）。

欧元硬币共有8种面值，正面是相同的，有硬币的面值（1欧分，2欧分，5欧分，10欧分，20欧分，50欧分，1欧元，2欧元）。硬币背面的图案由发行国自行设计，君主立宪制国家多为国王头像，其他国家则选择能代表国家形象的图案。欧元纸币共7种面值：5欧元，10欧元，20欧元，50欧元，100欧元，200欧元，500欧元。面值越大，纸币面积越大。纸币正面图案主要是门和窗，象征着各国和谐的生活在欧洲；纸币的反面是桥梁，象征欧盟各国联系紧密。各种门、窗、桥梁分别代表欧洲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古典派、浪漫派、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铁式和玻璃式以及现代派，颜色分别为灰色、红色、蓝色、桔色、绿色、黄褐色和淡紫色。纸币正反两面分别为统一图案，无任何国家标志。欧元纸币用棉纸制造，有复杂的安全措施：水印、

红外、全息图像、微缩印刷等。尽管如此，欧元纸币自问世以来，500欧元，特别是100欧元以上的大面值欧元日益成为假币犯罪集团的目标。公众很少使用500欧元纸币，普遍认为面值过大，建议停止流通。2016年5月4日，欧洲央行宣布：2018年底将永久性停止发行500欧元纸币。



## 魂牵梦萦忆俄院

向祖文

作者简介：

向祖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1961 级校友，中国社会科学  
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异邦，  
皇村才是我们的祖国。

——普希金

丹枫迎秋，金风送爽。在这金色的九月，我们迎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光华灿烂的七十五周年华诞。北外校园，欢声笑语；俄语学院，喜气洋洋。在这吉祥欢乐的时刻，我们怀着最真挚、最热诚的情感向母校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祝愿您继往开来展宏图，雄心壮志谱新篇！

祝愿之余，我们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那难忘的 1961 年。那一年，我们带着满脸的迷茫，怀揣美丽的梦想，迎着九月的暖风，直扑您的怀抱。您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这一群莘莘学子。

学府春色，玉垒浮云，名师荟萃，英才辈出。在这钟灵毓秀的人文之邦师生们共唱大风，齐铸辉煌。

俄院啊，您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想当年，我们如同园中的花朵，在春天里茁壮成长，鲜艳开放。园丁们引导我们研习《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树起了人生的灯塔。我们曾在这里高唱理想之歌，度过璀璨烂漫的时光，放飞希望和憧憬，编织着人生的七彩之梦，何等甜美！

俄院啊，您是我们的知识殿堂。恩师们用平凡的劳动、渊博的学识谱写伟岸生命的乐章。师长们

曾在这里指导我们研习俄语作品，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们在灯下品味文笔犀利的《猎人笔记》，多少个朝霞如火的清晨，我们诵读高亢激昂的《海燕之歌》，接受俄语美感熏陶是多么地惬意啊！

俄院啊，您是我们的求索驿站。俄院五年沧桑，那是我们人生中最充实的季节。恩师们带领我们走出去，在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我们在这里磨砺拼争，获得了许多具有广度和深度的人生体验，练就了能吃苦耐劳的躯体。在中华大地谱写奋斗诗篇多么美好啊！

俄院啊，您是我们的成长摇篮。恩师们把英雄人物请进来，给我们讲述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他们的思想，蕴含哲理，他们的言辞，洋溢着诗意，又显得富有魅力——呵，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些教诲曾激起过多少美妙的涟漪，又勾起了多少幸福的回忆！

母校啊，是您哺育了我们，是您燃烧了我们。在我们的热血里，有卓娅的勇敢，有保尔的坚强，有普希金的激情，有高尔基的厚重，有马恩的奇思，有列宁的妙想，这些英雄模范和人类先哲，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惊天动地的业绩影响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使我们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五十年前，我们在美丽的北外留下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我们正是从这里启程，开始走向人生的辉煌……

弹指一挥间。从我们大学毕业到现在，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砥砺奋进，五十年春华秋实。当年

青发如云的同窗，现在身居五湖四海，天各一方。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任它年华如水流，依旧豪情似大江。

告别了翩翩少年，走过悠悠中年，如今我们已进入生命的秋天，但我们这个群体永远有着共同的情怀。回忆母校，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那激动人心的岁月，忘不了辛勤培育我们的园丁。在人生旅途上，是恩师为我们点燃了希望的光芒，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茁壮了我们的智慧，但更重要的还是园丁以素质教育为本，铸就了我们高尚纯净的灵魂，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品格促使我们当年学业名列前茅，支持我们今天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回顾青春岁月，难忘母校的养育之恩；回首五十年的征程，我们的每一份成绩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劳动和汗水。桃李满天下，师恩如海深。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向母校致以崇高的敬意。母校啊，我们的心在喊着您，我们十二万分地感谢您。

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

母校啊，我们满怀敬仰之情，向您献上鲜花，让她带着最美好的祝愿，飞到美丽的校园，萦绕在恩师们的心灵，直到永远，永远 .....

## 盼望

——写在北外返校日前夕

于基明

作者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1971 级校友，毕业后留校任政工组宣传科干部。后调到济南铁路局党委工作，现任济南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我是如此地盼望  
盼望着九月第三个周六  
就像山泉盼望海洋  
就像游子盼望故乡  
这个日子  
赛过春节  
胜过重阳  
它是我一年中  
最重大的念想

一天天数  
一天天盼  
终于盼到  
秋风吹拂  
菊花飘香  
我的心儿向着北京飞翔  
到那一天  
我将登上北去的高铁  
同学们  
也将从四面八方  
来到母校的身旁  
师生再聚首  
嘘寒问暖  
促膝谈心  
倾诉衷肠

难忘啊  
1971 年秋  
我们从五湖四海  
汇集到湖北沙洋  
曾记否  
清晨  
朗朗的读书声  
在田野上空回响  
一声哨响  
出操的队伍  
步伐整齐  
口号嘹亮  
迎着初升的朝阳  
我们放声歌唱  
  
简陋的教室  
难挡学习的激情  
艰苦的劳动  
磨练了思想  
有人戏称  
沙洋是我们的黄浦  
我说沙洋  
是我们进入北外的井岗  
在那里磨练了意志  
开始走进外语的殿堂

一年后  
回到北京  
岁月蹉跎  
风云激荡  
师生合力  
胸怀朝阳  
三年多  
挥手一瞬间  
迎来毕业的时光  
惜惜离别  
奔向四方  
  
我们  
在各自的岗位上  
勤奋工作  
积极向上  
但从未忘记  
我们是北外的学子  
北外——  
我们心中的太阳  
走到哪里  
我们也不会忘  
任何时候都会  
向着北京  
向着北外的方向  
祝福

遥望  
同学情  
师生谊  
在我们的心中深藏  
四十一年过去了  
我们都已年过花甲  
思念同学  
思念老师  
思念母校  
激情  
在心中荡漾

我们的母校  
我们的师长  
最理解我们的心情  
定下返校日  
让我们每年都能欢聚一堂  
在母校的怀抱里  
我们永远年轻  
永远充满了理想  
北外  
就是我们大家的  
再生爹娘  
老师们  
永远是  
我们人生的偶像  
同学们  
胜过手足  
成为日夜思念的同窗

盼望  
就要成为现实  
九月第三个周六  
已经不再遥远  
高铁的车票  
已收入我的行李箱  
母校  
我来啦  
老师  
我来啦  
同学们  
我来了——

当我们相见时  
双手紧握  
四目相向  
我们会发现  
岁月的痕迹  
深刻在我们脸上  
但不变的情谊  
更深刻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  
为相聚欢呼  
我们  
为对方的幸福歌唱

返校日——  
团聚日  
幸福日  
加油站  
人生路途上的良港  
每一个返校日  
都是我们前进的新起点  
鼓舞着我们  
扬起风帆  
乘风破浪  
向着人生的远方  
续航  
续航  
再续航  
对于我们  
六十岁——  
那只是新人生的一岁  
百岁——  
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要伴随着母校  
不断前进的步伐  
锻炼身体  
提升素养  
日日快乐  
年年健康  
每一个返校日  
我们都会相应母校的召唤  
从世界各地  
汇集到母校

欢聚一堂  
畅谈人生  
再叙理想

## 1966 届同学毕业 50 周年纪念

李延麟

作者简介:

李延麟,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1966 届校友。

回首犹如一瞬间,  
峥嵘逝去五十年。  
书生意气横江海,  
学子雄心漫谷山。  
桃李不言芳草地,  
梅菊潇洒雪霜天。  
人生纵使八千岁,  
爱校尊师理所然。

душой относились,  
Серьезн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ечта наша сбывалась  
нелегко, но удел для всех  
справедлив.

Все мы наконец-то  
добились своего,  
и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по-  
своему счастлив.

Проходили годы, и мы  
испытывали многое на  
себе.

Как вечно зеленые  
сосны, мы твердо стоим по  
горам.

И всем достигнутым нам  
и в жизни и труде,

Мы обязаны нашим  
уважаемым и дорогим  
учителям.

俄语译文:

Оглядываемся на  
прошедшие 50 лет,  
Как будто все в один  
миг прошло.  
Но вечна молодость  
наших сердец,  
Хотя сколько воды уж  
утекло.

С высоким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мы учились,  
Усердно, старательно 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К работе мы со всей

# 行香子 毕业 50 周年纪念

李延麟

昨日书声，今日心胸，  
五十载，尝赏人生。

有风有雨，时雾时晴。

醉晓山清，云山梦，雪  
山明。

云舒云卷，花开花落，  
时时忆，逝去峥嵘。

念老师恩，学子意，故  
园情。

俄语译文：

Памятны учебные годы,  
Которые помогли нам  
крепко расти.

Бывали погоды и  
непогоды,

Мы все же уверенно шли  
на своем пути.

Когда прошлое уже  
позади,

Невольн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хочется  
проникать

Аудитория, дорожки и  
утренние лучи,

О чем ни когда нельзя  
забывать.

Кого мы должны и  
скренне благодарить,

Так это наших почтенных  
учителей.

О их подвигах надо с  
уважением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они учили нас быть  
человеком среди людей.

## “爱北外 · 校友捐赠”倡议

亲爱的校友们：

又是一年骄阳似火，母校又将送别一批风华青春的学子。母校留下了你们难舍的情谊、朗朗的书声、厚重的师恩和曾经的熟悉。74载风雨春秋，母校感谢你们的关怀和支持，你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母校最欣慰的荣耀。

2008年至今，很多校友热心公益，关注母校教育事业，极大地支撑了母校的发展。为了用好校友捐赠的每一分钱，对校友的每一份爱心负责，在广大校友的倡议下，母校于2012年6月7日启动了“爱北外·校友基金”，将校友的捐助按意向妥存，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每年定期公布和反馈基金捐赠和基金使用情况，原“我爱北外·校友年度捐赠”项目纳入“爱北外·校友基金”统一管理，具体内容如下：

### 一、基金用途：

- 1、在校生奖助学金；
- 2、校园建设和院系教学科研建设；
- 3、组织开展值年返校、校庆日、校友论坛、沙龙、研讨会等各类校友活动；
- 4、联络校友，收集校友信息，维护校友信息数据库；
- 5、按照捐款人意愿实施的资助项目；
- 6、服务于北外校友的其他工作。

### 二、基金捐赠原则：

真诚自愿、数额不限。

### 三、基金捐赠项目：

#### 1、“爱北外·年度捐赠”

每年捐赠的人民币数额与母校年岁相等（如，北外始建于1941年，到2016年，建校75周年，可以捐献75元，以此类推），可以一次性捐足两年、三年、四年或者更多年份，数量不限。所有捐赠款项将全部汇入“爱北外·校友基金”，纳入母校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每年的捐赠和资金使用情况都将通过校友刊物《北外人》和校友网公布，同时在母校教育基金会网站公布。

作为留念与答谢，捐赠校友将得到一枚精美的纪念卡。纪念卡印有母校标志建筑及建筑简介，寄托着您在母校的美好记忆，也记载着您对母校的深情回馈。如一次捐足四年全部款项（共计人民币306元），捐赠者将获全套四枚纪念卡联张。

#### 2、其他项目：

母校同时设置了其他待捐赠项目，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思言行发展基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化战略人才培养基金、“国才智库”专项基金、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基金等，各基金具体信息可以在母校教育基金会网站查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网址：[jjh.bfsu.edu.cn](http://jjh.bfsu.edu.cn)。

如一次性捐赠数额超过10万元，校友可以按照个人捐赠意愿，与校友办或母校其他院系、单位协商，成立相关子基金。

### 四、捐赠方式：

1、现金捐赠：到学校校友办直接捐款，由基金会开具捐赠收据。参加“爱北外·年度捐赠”项目，由校友办发放纪念卡。

#### 2、邮局汇款：

汇至：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周静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邮编：100089

**【温馨提示】** 邮寄时请写明毕业时间、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如年度捐赠等。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如参加“爱北外·年度捐赠”项目，由校友办寄送收据和纪念卡。

#### 3、汇款：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名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账户账号：0200007609026407232

**【温馨提示】** 邮寄时请写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如年度捐赠等。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若参加“爱北外·年度捐赠”项目，由校友办发放纪念卡。

4、网上捐赠：母校教育基金会网站开通网上支付功能。使用网络捐赠功能，请登陆[jjh.bfsu.edu.cn](http://jjh.bfsu.edu.cn)，点击右下“捐赠方式”，选择“网上捐赠”即可在引导页面的指导下填写信息，实现网上支付捐赠款。

# “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 捐赠倡议

兼容并蓄是母校拥有的世界眼光和开放胸怀，博学笃行是母校赋予师生的知行品质。为帮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特启动“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捐助困难学生工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筹资渠道为校友个人、校友企业及各类型校友团体、班级、年级等。助学金以在校生一年学费 6000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为单位进行筹集。助学金用于定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每人每年 6000 元（学费）或 12000 元（学费加生活费）。学校将对每一笔捐赠开具正式收据并在校友会网站（xyh.bfsu.edu.cn）上进行公布。

## 一、捐款方式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捐赠，校友可根据情况自愿选择：

1. 大学四年每年捐赠 6000 元人民币，或一次性捐赠 24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一名贫困学生的大学学费。

2. 大学四年每年捐赠 12000 元人民币，或一次性捐赠 48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一名贫困生四年的学费及生活费。

以上两种捐赠方式均为定额定向捐赠。校友可以进行一对一捐赠，也可以加入一对多捐赠，捐赠的校友个人或团体可以与被捐助学生进行互动。捐赠者均可在当年按照个人意愿对此捐款冠名，如“北外 XXX 校友（团体）涌泉助学金”。

## 二、捐款途径

### 1、现金捐赠

到学校校友办直接捐款，由基金会开具捐赠收据。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行政楼 7 层）

### 2、邮局汇款

汇 至：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周静收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 编：100089

【温馨提示】 邮寄时请写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涌泉助学金捐赠。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

## 3、银行汇款

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名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账户账号：0200007609026407232

【温馨提示】 汇款时请写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涌泉助学金捐赠。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

## 4、网上捐赠

母校教育基金会网站开通网上支付功能。使用网络捐赠功能，请登陆 [jih.bfsu.edu.cn](http://jih.bfsu.edu.cn)，点击右下“捐赠方式”，选择“网上捐赠”即可在引导页面的指导下填写信息，实现网上支付捐赠款。

##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 周静

电 话：010 - 88810192 传 真：010 - 88810192

邮 箱：[bwxyh@bfsu.edu.cn](mailto:bwxyh@bfsu.edu.cn)

地 址：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会，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 校友捐赠名单

## “爱北外·校友捐赠”名单（2015.3-2016.7）

刘道义 920 元

林坤 420 元

谢德保 300 元

李作良 500 元

赵从光 500 元

## 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捐赠名单

张开帙 24000 元

麦林 12000 元

王一兵 5000 元

# 回馈母校 DONATION

##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树木认养基金”捐赠倡议

您想为自己的母校认养一棵树木，见证您在北外这段珍贵的记忆吗？那就让我们马上行动，一起参与到校园树木认养活动中来吧！

具体领养办法如下：

### 1. 认养主体

认养主体可以是校友班级、校友分会等集体形式，也可以是校友个人、校友夫妻、校友兄弟、校友父子、母子等形式。

### 2. 认养范围

主要包括校园内已经成活的树木，单株或数株。具体由后勤部门研究后划定，并向师生及校友发布。

### 3. 认养周期

每一个认养周期为五年，校友按周期进行认养。可以认养多个周期。

### 4 认养的费用标准

不同的树木所需费用不同，具体数额由校园管理中心确定。

### 5. 认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校友：认养树木的校友一次性缴纳认养树木费用。

在认养期间，校友享有树木的冠名权。

认养到期后，优先续订认养协议。

2) 学校：认养树木的养护由学校负责。

对认养树木进行冠名。学校校园管理中心对认养树木登记造册，并统一制作标牌，标明认养主体的个人姓名或集体名称、认养时间等信息。

科学管理和使用认养款，专款专用。认养款纳入到学校教育基金会专项管理，主要用于树木的维护养护、校园整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建设等。

### 6. 认养程序

1) 向校友办提出认养申请；

2) 校友办牵头，校友和校园管理中心协商确认认养树木；

3) 签订认养协议，明确权利和责任；

4) 开展相关的认养活动。

绿树认养承载着校友对母校的拳拳深情，通过绿树认养活动，不仅可以使母校的树木得到及时、周到的养护，同时还可以铭志于树，寄情于绿，留下一份永久的纪念。

联系电话：

010-88810192（校友办周老师）

010-88816500（校园管理中心李老师）

## 《北外人》征稿启事

亲爱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母校校友工作的大力支持！

为使《北外人》在选材范围、内容质量等方面有所拓展和提升，现面向广大校友诚征来稿、来函：

1. 文萃部分：欢迎提供自创作品，或推荐其他校友作品（已在其他刊物或网络上登载的亦可）。内容、体裁不限，篇幅 1000-3000 字左右，同时欢迎提供相关图片、照片；

2. 艺术作品部分：欢迎提供个人书画、摄影作品，或推荐其他校友作品；

3. 专访部分：人物专访是《北外人》的点睛之笔，欢迎推荐专访人物，并提供相关线索和信息；

4. 校友动态部分：欢迎提供校友聚会、校友参与重大事件、校友获得荣誉、职务变动等信息。

同时，期待校友们在阅读本刊的同时献计献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来稿请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0192/88816379/88810271

传真：010-88810192

电子信箱：bwxyh@bfsu.edu.cn

热烈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  
建校 75 周年校庆!



热烈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60 周年系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会官方  
微信服务号二维码



北京外国语大学